

# 明代南海华人研究主持人语

王琛发\*

—

自 1511 年葡萄牙人入侵马六甲海峡起，中华民族卷入了南海世界的新一轮历史变革，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变局。Michael J. Salevouris 和 Conal Furay 在《历史学的方法与技巧：实践的指导》（*The Methods and Skills of History: A Practical Guide*）里提出：“历史就是过去的本身，以及其重构，或者是一种关于过去的叙述。”本次专栏主题《明代的南海华人：多元的叙事》收集了三篇文章，讨论背景都是明朝以来的演变。在这个时代，亚洲东部诸国正处于中华明朝时期。在这个长期共荣共存的航海时代中，各个民族共同繁荣。然而随着 16 世纪西方殖民的兴起，发生许多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不仅深刻影响各方面的历史记忆和主权诠释，也成为现在流传的许多历史、神话和传说叙事的源头。

松尾恒一的《明清代的海上势力和东南亚、东亚的华侨——以欧洲势力进入亚洲为背景》，深入探讨了明清时期中华民族在东亚与南海地区的海上势力，以及在这片区域的原住民、华侨和穆斯林等多元人种和宗教信仰的共存情况。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相继进入亚洲，扩张殖民版图之际，各方在宗教和商业方面的知识差异更显突出，导致社会问题不断涌现。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各方基于自身的知识体系和权力观念塑造了当时兴起的历史、神话和传说叙事。松尾恒一特别关注于阐述根据“华南海盗”所构建的叙事，以及这些叙事中的多样印象。在各种语言文本的历史和传说中，对于这些“海盗”的描述存在差异，有的强调其对南海经贸的贡献，有的关注他们照顾当地水土民众的生计。因此，严格来说，这些“海盗”已不再符合中国朝廷传统概念中“盗”的定义。

---

\* 王琛发，博士，闽南师范大学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英国欧亚高等研究院——马来西亚道理书院院长；马来西亚韩江传媒大学学院中华研究院特聘教授；福建省闽江学者；广东省海外名师特聘教授。Email: ongsh@hju.edu.my

王琛发的文章如题,《“汉丽宝叙事”:“马来纪年”回忆、想像与重构的明朝邦交印象——兼论上世纪马来西亚中文书刊与课本诸种“汉丽宝”书写的再想像》。本文主要通过《马来纪年》对读《明实录》,探讨《马来纪年》成书于西方殖民者占领满刺加港口都城之后,主导着马来世界集体主权记忆的隐喻,何以不提明成祖与郑和,反而是以“汉丽宝叙事”为核心,构建出中华与马来世界自古便有共同“远祖”以后的“亲上加亲”,由此衬托着现实中“汉丽宝后裔”正参与抗击殖民者的事迹;由此再讨论,在上世纪殖民者撤退前,马来亚华文小学课本曾经赋予汉丽宝传奇许多《马来纪年》原所未有情节,以及由此衍生的许多叙事版本。

欧俊勇的文章题名《16-17 世纪西方游记中的闽南与世界》。本文相对松尾恒一和王琛发之文字,更侧重以明朝南海各地出现的华人历史和传说为史料,把视角移向从那时起来往南海与闽南之间的传教士。16-17 世纪,南海各民族还是延续着彼此祖先形成的生存共同体,使用着共同的海域互通有无;包括生活在各地的华人以及地方族群,流传了许多以地区历史为背景的历史、神话、传奇乃至文艺创作。

16-17 世纪西方传教士活跃东来的初期,教士是借助着南海和闽南地区自古山海相连的地理,依循亚洲各族民众长期往来彼此聚落之间的海上航路,开始以闽南作为了解中国的前沿地带去观察华人,并且在使用彼等视角去理解这些各地华人的历史、神话与传奇以后,再生产这些叙事,带进彼等自身的知识与话语定位当中。传教士在此游历和传教过程中撰写了大量游记作品,描述闽南日常生活镜像、商业贸易拓展和东西方文化比较等内容,使得闽南地区和闽南人在“西学东渐”和“中学西渐”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 二

中华民族在亚洲东部的历史,始终与祖辈们在南海地区的交通与拓殖密不可分。关于丝绸之路沿线各地的华人聚落,这一信息早在汉朝时期就有了记载,而在宋元至明朝时期,这已经成为各种语文记录中的常见事物。南海地区的地方历史同样留下了许多文明交流和互鉴的痕迹,无法抹去华夏先民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与贡献。

从印度洋东岸开始的文明交流和文化互鉴，各地区、各族群的文化元素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这一过程既源于商贸往来，文化交流，技术互授，信仰传播，语言影响等多方面因素，也包括了各地战争的影响。这些因素至少促成了华东南和南海地区长期海陆相通，形成了共同的生活世界。

在海丝沿线，无论在各地的华人与其他族群之间，还是不同地区的华人之间，以及各国往来的访客，都有可能通过文字、雕塑、绘画、歌乐、戏剧、建筑、口述等多种方式，记录和传承他们对于不同地区华人社会的所见所闻。这包括了历史中真实、遮掩、虚假或片面的记忆，还包括了已经演变成神话或传奇的记忆。各种不完整或甚至碎片式的记录，都足以引发一系列的讨论与反思，形成了一个绵延不断的过去到现在，并将持续影响未来的历史进程。这一切都在不断进行中的结果，也将一再构成未来历史，上述三文，正是基于明代以来诸种语文史料渐为丰富，得以相互对照，从不同角度探讨南海华人世界由那时起经历海上多元交流的不同领域遭遇。

承上而言，不论历史、传说、历史记忆，乃至就历史或传说加工的文艺创作，表面属于不同概念，共同点都是由一系列的历史知识构成的组合。尼采生前未发表早期论文《真理与谎言》提到“隐喻”（Metaphor）的概念，是说人们不论进行叙事或接受叙事，叙事在同时也会左右的意志，参与建构着个人对自身和外境的认识，使得个体意识着自身作为处在历史时间的延续的立场。而参照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福柯则是再三把知识、真理、科学等词句互换的使用，联系着“话语”，同时把“话语”联系在“叙事”。

传统的认知总以为历史知识在于揭示事实，可是知识一旦通过叙事传播，“知识”和“叙事”就不能不是权力的再现，可以体现为强势方的话语霸权，也可以体现为弱势方寄托在内容元素与情节当中的意愿。历史的“知识”，正如其他各种“知识”，其话语的描述经常会倾斜向叙事者的思维态度，知识的权力特性亦是表达着话语的所在或诉求。不同的历史叙事，重构不同的记忆印象，反映如何才是理想中重新配搭的人、事、物关系。

三

从南海交通历史的视角来看，自三国东吴首次以官方经略南海、与各邦进行交往开始，这一情形在中华历朝自古以来的海丝文献中都可以找到。在这些文献中，历史知识的采集、表述内容与方式的变化，都构成了一种叙事，通过比较不同邦国的历史记忆，也可以看出历朝自身话语的表达方式和态度的变迁。《梁书》卷五十四《列传第四十八·诸夷·总叙》提及，三国东吴孙权为了沟通南海诸国，曾遣派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出海，并要求彼等为经过或听闻的百数十国立传。吴国留下的好些对外交流文献当中，便有《扶南国》的记载，说扶南王室以“范”为姓，国人习惯裸体，唯有妇人会穿著贯头衣；朱应和康泰曾经告诉扶南王范寻：“国中实佳，但人褻露可怪耳。”范寻始令国内男子穿著后人称为“干漫”的横幅，大户人家截锦为之，贫者乃用布，即现在南洋习称的“纱笼”。《梁书》的同一部分也记载，不论扶南国北方的《林邑国》，或更南在梁朝时已经立国四百余年的《狼牙修国》，以及《婆利国》，在梁朝时都流行穿干縵。《中天竺国》位处印度中央邦和北方邦，以及现在是斯里兰卡的《狮子国》却没有类似记载。在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东盟各国至今流行的这种男性穿着，与我们可能想像的本土文化接受的印度化影响并不完全相同，实际上更多地受到了吴国自扶南以来的区域影响。

历史上的权力和权力关系都是动态的，叙事作为支持权力与促成权力关系的动力，也在表达着权力的动态。只要一时一处的社会精英尚有能力掌握所在范围的公共话语权，他们就有可能统合各种历史的文化观念与说辞，通过延续与建构历史和文化的叙事，继续为统治的势力生产权力。他们可能主观上不曾想像要如何设定社会倾向与集体行为，可是他们在语言文字和文化创作，也会向着周遭投射出他认为最好的、符合社会利益或权势接受的知识样貌。特别是在古代，传抄和印刷面临昂贵的时间与物质成本，各种叙事文献记叙，不管是题材或内容取舍、表述方式，传播形式，或然相异，有的是承载着主流权力意识，有的体现着异议者的权力意志，也有的是以一个群体或区域的话语，相异于其他群体或区域对待同一历史事件的叙事。而它们的共同点则是通过文字再生、印证、演变和传播，实现着附和或者对抗主流权力的态势，由此也形成彼此的对话，并且会随着权力关系的变化再生产更多的叙事演变。

《梁书》中关于《中天竺国》的部分提到了罗马和汉朝之间的往来。确实有记载罗马人进行贸易活动，与扶南、日南、交趾等地有联系。然而，汉代和罗马帝国之间唯一的官方邦交记录是大秦王安敦（罗马国王安东尼）派遣使者于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 166 年）来到汉朝，这一事件发生在汉朝现在位于越南中部的日南郡境外。此后，直至东吴孙权黄武五年（公元 226 年），有来自大秦的贾人秦论访问交趾，被太守送往会见孙权，介绍罗马的土地、风俗和谣言。不过，《梁书》也强调，除了罗马人来华外，汉境以外的南海诸国很少有人会到罗马。回溯《梁书》之所以会在《中天竺国》穿插《后汉书》也曾有的罗马记载，除了补充吴国以来与交趾通罗马的历史，还有可能是为了追溯昔日的海陆交通行程，尤其是关于罗马人如何到达华夏的路程。当时，罗马人若要来到中国，必须通过穿越印度大陆这一艰难的过程，一直往南穿过印度，最终渡海到达中国。

随季风到达狼牙修国（后来演变为马来亚吉打王国），在狼牙修以西上岸修养后，必须通过陆路向东走向狼牙修东岸，才能乘船北上，抵达旧时犹属汉境的交趾。对照《吉打纪年》这部以神话传奇颂扬狼牙修开国的史书，描述了狼牙修的开国国君被描绘成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的后裔。这位君主为了护送罗马公主与同样具有相同祖先的中国皇室成婚，在途中遭遇印度人崇拜的神鸟迦楼罗（大鹏金翅鸟）制造的风浪，只得搁浅在当地建立国家。在狼牙修的开国君主最终完成了罗马与汉朝的通婚后，他选择返回罗马，并嘱咐儿子在继承王位后将国土分为暹罗和霹雳两个封国，封赐男孙，同时再将孙女封为北大年国主。《吉打纪年》故事构成了梁朝海上丝绸之路之路上最早结交的一些中途国家的建国神话，是马来世界较能普遍接受的，都在强调自身本土文化拥有东西文明的“亲人”关系。

#### 四

这次栏目的三篇文章都巧妙地选取了明清以来发生的现象作为主题。从 1511 年葡萄牙人占领满刺加的港口城市开始，明朝时期的华人参与了南海各民族的共同体，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在这之后，历史的发展自然是不断演变的，而列强殖民竞争使得历史变得更加复杂。随着历史的推移，产生的历史叙事也不再像过去南海多

民族生存共同体那样简单。由于在共同的生活环境中，对历史叙事产生了许多共同的回忆，相互之间进行补充并将情节融合在一起，形成区域性的集体记忆。相反的，从那时起，同样历史事件，常会加添出许多源自殖民官员、西方教士或他国派遣观察者的书写材料，不同源头的叙事会侧重报告事迹的不同情节，选择的内容、使用的词汇，加入的意见也有所差异。不止是官员和传教士会成为叙事的书写者与传播者，在接下去的几个世纪，《马来纪年》、《吉打纪年》等书籍陆续编成与传播愈广，也反映着南洋群岛的民众正在由历史走向建构神话与传奇，超越在现实的巨变之外，从口述到书写，重构着对知识与权力的自我认知。

回归早期《梁书》和后来的《吉打纪年》，可见不同时代出现过不同语境的叙事，还有历史的叙事和神话的叙事，对于昔日南海古国起源与各自文化的记忆，包括文明互鉴的记忆，各自精彩。由此可知，不论历史、传说、历史记忆叙事，都能构成知识与认识来源，叙事的话语也是构成知识与认识差距的源头。这些“知识”不论来自文献或口述，或者是由口述而文献，尽管在表面能维持中性的色彩，也还是能构成研究历史传承过程的史料，从中亦能发现其作为知识的叙事内容所体现的权力意志，以及其合理合法化乃至神化自我认知的话语权。因此，历史的叙事不仅构成了知识和权力的相互交织，更体现为形成叙事内容的故事组合，即权力的生成、再生、复制，甚至是扩大的过程。不同来源的史料不仅仅保留了原始历史在碎片化后的痕迹，同时也反映了叙事者与接受者在主观选择和理想记忆上的共鸣。这些史料之间的互补、相互参照、对照相驳以及辩证互解，实际上是一种深入探讨权力和话语态势的方法，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辨别、判断，并超越各种原有的叙事。通过审视知识、话语，甚至权力观念的差异，从那些不完整的叙事中追寻更为完整的记忆。

松尾恒一的论文，提出明朝许多海上势力的代表人物，他们的队伍在东亚至南海，一直跨境活动，这显然是合乎历史以来先民的生活形态，是把整片海域视为其所认同和归属的整体社会活动范围。来自不同势力背景的人拥有各自独立的主体意识和权力概念。他们使用的不同语言文献对待这些海上人物的叙事，包括他们跨境传播的神话和传奇，反映了在不同权力关系中，同一个人物可能被描述成不同的身份和定位。菲律宾马尼拉李旦以及泰国北大年林道乾的历史，还有林道乾妹妹林金莲的神话，前者的历史印象会因着

各种语言转述不同地区的记载，互有出入、褒贬不一。而后者的神话则更多承载着地人的记忆，有通过信俗与传说延续与凝聚不同族群各自认同的思维倾向。而清人以海盗事迹演变文学作品《金云翘传》，在越南演变为成当地国民文学经典的长篇叙事诗《金云翘》，在日本也由曲亭马琴改编成通俗小说《风俗金鱼传》，也可以说明同源叙事在主角原型的活动区域一旦演变向不同语言地区的传播，也在表达着相应于地区社会文化意识的差异性。

王琛发研究探讨了《马来纪年》通过构建汉丽宝叙事来回顾、想象和重构的明朝与马来王朝友好印象，企图对“汉丽宝”传说的合理背景思考：《马来纪年》是在历史的剧烈变革时刻，通过人们把历史记忆、神话和传奇化的过程，将中华视为亲密盟友而将葡萄牙人视为敌仇，从而重新构建和解读集体理想中的对外关系与民族自信。本文兼且论及马来西亚 20 世纪中叶建国初期的中文书刊与课本，谈论课本出现诸种“汉丽宝”书写的再想像，以致后来发生诸种“汉丽宝”叙事并行的现象。本文也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当历史记忆不完整，殖民者又是在即将离去之际继续主导原殖民地教育改革，原本受到殖民利益和西方话语左右的族群关系认知在国家定位的演变中逐渐失去影响，原有的教学文本并未被殖民者在临去秋波前夕植入属于不同族群和语境的共同叙事，“汉丽宝”的传说在缺乏历史探索的“他者”叙事之中，又是如何被赋予新的内容元素和不同的涵义，以服务于各方的叙述意图。这些经过再三转变的叙事又是如何影响了同一个国家不同族群社会，引导他们从原殖民语境的影响中被生产出认识差异，走向各自对“信史”理解的叙述。

历史的叙事，特别是从历史背景上边产生的神话叙事和传奇故事，都是具有文化编码作用的。当历史的叙事演变为神话或传说的叙事，以至经过文字回应时代的思想加工，它们的故事作为一种“隐喻”，就是以曾经的真实，作超越现实界线的加工，由此更是有效的一而再的反映着人们对现在、历史与未来的各种感性要求，抒发着各自想像的理想境界，神话活传奇由此也可说是另类的真实叙事，包括投射出叙事者对所知版本和本身所处境的权力关系。

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运用了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来阐释他的观点。他的理论清晰地表明，“东方”的知识并不仅仅是属于“东方”的，而是在西方人通过他们自己的知识权力话语系统构建出来的。这一说法，从殖民地构建自殖民者的生活经验，是可以理解的。西方政府想要治理好官员印象陌生的东方，西方传教

士想参与教会使命中需要拯救的亚洲，他们首先就得理解当地各种历史的、神话的、传说的叙事，并试图去理解相互原来词汇体系和思维脉络所没有的概念，再去向着以西方各国文化建构自身知识的其他人作解说。这无疑也是一种在不同语境中的再叙事，以各种语言词汇的概念从不同的视角重新构建自身的叙事。在这个过程中，使用外来叙事的内容来进行自身的叙事，并不是简单地再生产原有叙事的话语。从欧俊勇的文章引用加里奥特·佩雷拉《关于中国的一些情况》，提及福建闽南一带也因为对外的走私贸易为西方人所熟知，以及平托在其著名的《远游记》描述葡萄牙人在从巽他、满刺加、帝汶及北大年到漳泉的航海网络，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人既是对闽南人跨海社会的熟悉者，也是以外来者模仿着闽南人原来航路和贸易区域而获取利益。而他们的叙事包括各种认识、观念和评论，也反映着他们的话语，表现了他们认识东方过程的权力意识。而西方陆续出现的这些相关闽南人、闽南地区的历史叙事，在往后配合着列强的船坚炮利，是陆续的积累也逐渐的构成西方人认识的东方知识的主流，最终巩固着西方对东方的话语权，是我们现在所见得到的。

## 五

不论是历史、传说，还是源自两者的艺文创作，都根植于历史记忆。这些历史记忆被固化为历史，有些成为百姓口口相传的故事。其背后涉及时间性、社会背景、复杂事件和评价性结论等多因素相互结合，共同构成一系列连贯的故事。最为重要的是，叙事不仅提供了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认知，还为了了解身份建构的过程提供了窗口。通过叙事的构建和接受，个体塑造了自己的自我印象，包括过去、现在，以及他们希望未来成为的样子。同时，通过深入研究叙事的内容，包括叙事者和接受者的背景，以及他们所处的环境，我们可以追溯叙事的兴起、传播、演变，甚至是式微的过程，从而了解叙述者的演变，以及发现流传地区社会或群体的权力意识与相应的理想倾向。这些元素曾经、现在都在影响着彼此如何看待自身，并决定了他们的实际行动。

# “汉丽宝叙事”：《马来纪年》回忆、 想像与重构的明朝邦交印象

——兼论上世纪马来西亚中文书刊与课本诸种  
“汉丽宝”书写的再想像

王琛发\*

**摘要** 以《马来纪年》对读《明实录》，《马来纪年》既不提明成祖也不说郑和，而是以“汉丽宝叙事”为核心，将马六甲王朝和明朝的建交时间挪后至满速沙国王年代，述说中国皇帝忆起双方祖宗同源、羡慕马六甲国势、主动遣使邦交、再又遣公主和亲，由此叙述其中各种传奇。若回顾《马来纪年》的书写背景，书中的“汉丽宝叙事”毕竟是发生在马六甲都城沦陷以后的百年抗战期间，传说人物的子孙尚有参与朝政。由此或应思考，此一历史传说足以反映马来世界反抗西方侵略的历劫沧桑，“汉丽宝叙事”出现许多传奇和隐喻，是以不完整记忆的海上叙事，综合许多想像与建构、神话与传奇，表达“兄弟之邦”平等共荣的愿望，既是珍惜着明朝一路友好支持，又是遗憾明朝无力支持复国，重构其族群自我期许与对外认知。马来西亚独立后，“汉丽宝公主”曾经长期被纳入华文小学历史课，也曾一再被华人文人重新想像书写，之后经由旅游话语推波助澜，由此又产生了华文世界各种有别于《马来纪年》记忆脉络的版本，形成各种另类族群关系的想像。

**关键词** 《明实录》 满刺加 历史印象 英国殖民者  
华文小学历史课本

---

\* 王琛发，博士，闽南师范大学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英国欧亚高等研究院——马来西亚道理书院院长；马来西亚韩江传媒大学学院中华研究院特聘教授；福建省闽江学者；广东省海外名师特聘教授。Email: ongsh@hju.edu.my

## 一、“汉丽宝叙事”表达的真实或想象

在马来西亚，明朝汉丽宝公主下嫁马六甲苏丹满速沙的故事，作为马六甲王朝宫廷传奇的叙事，可说是脍炙人口，渗透在民间大众的记忆中，也一直成为旅游业者经常向游客们诉说的故事，以至许多外国人到马六甲旅游，都会接触到各种导游的版本，说有位明朝公主远嫁到马六甲和亲。如果查证明朝史籍，此事本来就难以找到文字根据，可是整体“汉丽宝叙事”作为承载历史文化记忆的载体，却是真实的承载着马来民众回顾昔日明朝与满刺加王国的感性思维，怀念着彼此结交也支持相互辉煌的海上关系。

稍微熟悉南洋历史的人们都知道，“汉丽宝叙事”本是源自一本名称《马来纪年》（*Sejarah Melayu*）的长篇历史故事，原文使用古代马来人常用的爪夷文（Jawi）书写。现在流传最广版本，则源自英国人希勒伯（W.G. Shellabear）的当代马来文版，改用罗马字母拼音取代爪夷文拼音。文中的 Putri Hang Li Po 原来也是爪夷字，转为罗马字母拼音后，当代汉字翻译几乎都译作“汉丽宝公主”。

《马来纪年》当中的汉丽宝故事大致是从邦交的由来说起，述说明朝皇帝想要与马六甲王朝和亲，就派了官员“Di Po”陪同公主，由五百位大臣女儿组成随从，远渡重洋，嫁到马六甲王朝；公主后来为苏丹满速沙生下后裔，随侍公主的宫女们也都被安排聚居在“中国山”（Bukit China），她们的后裔也归化了当地王朝以及皈依伊斯兰教<sup>①</sup>。

自从希勒伯对照多种不同手抄版本的《马来纪年》，1909年出版一再重复刊印多次以后的定稿刊行本，《马来纪年》广泛影响马来族群的知识分子。同一本书在马来西亚的中学到大学，至今也是学习马来文化或马来西亚历史的必读书。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汉丽宝叙事”则是通过华文学校课本灌输到学生的记忆。自1950年代到1980年代，《马来纪年》第十五章其中的汉丽宝故事，曾被简单化与“去宗教化”，删去苏丹要求公主与随员皈依伊斯兰教等等情节，以论叙马中和亲友好为重心，纳入华文小学历史课程，影响整整几代人的历史印象。

如今，随着马六甲旅游业发展，“汉丽宝公主”的传播态势越来越“国际化”。可是，走到马六甲所谓“中国山”原址，也就是

---

<sup>①</sup> W.G. Shellabear (usaha). *Sejarah Melayu*. Petaling Jaya: Fajar Bakti, 1986, hlm.95.

现在华人称为“三宝山”的所在，对照山上现存 12500 座墓碑石刻，却可结论，《马来纪年》所谓华人公主随从形成的聚落，以及他们的伊斯兰后裔，早已踪迹难寻。山上约 12500 座现存明清两代坟墓，刻石都以汉字为主，偶附英文对照；现存较完整墓形，还都会留下碑前设立拜台的痕迹，表明此地华人的儒释道倾向。其中最早石碑年代都在葡萄牙殖民马六甲原来都城之后，包括明朝万历甲寅年（1614）的“明故妣汶来（李）氏墓”及“黄维弘与谢寿组之墓”（1622）。由此可知，现在的“三宝山”除了马来名字依旧是 Bukit Cina，印证此地即是《马来纪年》提到的“中国山”，其他方面，毕竟不似坊间一些旅游笔记想当然的记叙，难以和《马来纪年》的记载直接拉扯关系。

《马来纪年》成书前，马六甲都城是早在 1511 年已经沦陷葡萄牙殖民者手中，王朝此后是据守着柔佛等周围领地持久抗战。《马来纪年》的内容，主要渊源于历代遗臣缅怀故国旧史的辗转传说，除了记叙马六甲王朝世系的起源和演变，还记载了个别人物生平轶事，其中夹杂不少神话和传奇。一说，这系列的历史记忆，由柔佛王国的王子 Raja Bongsu 所整理。这位王子在祖先痛失马六甲都城的 60 年后，在 1571 年出生。他生前积极主张联合荷兰人对抗葡萄牙以期复国，亚齐人在 1613 年攻陷柔佛后，和王兄一起被俘到亚齐。其后王兄在亚齐逝世，亚齐王又把妹妹嫁给他，送他回柔佛当国王，王号 Sultan Abdullah Ham'mat Shah。可是 Raja Bongsu 不曾放弃反抗。1615 年，他联合荷兰对抗阿齐失败，亚齐舰队再次攻陷柔佛首都。Raja Bongsu 带着支持者辗转流亡，既反对葡萄牙也对抗亚齐，直到 1623 年忧郁而死<sup>①</sup>。但是依据后来希勒伯考据多种《马来纪年》版本，1889 年刊行罗马字拼音马来文初版，在序文里提到，《马来纪年》的实质编修者 Tun Sri Lanang，是 Raja Bongsu 在位时的首相（Bendahara），奉王命编修于 1612 年<sup>②</sup>。另外，再根据 Sir R.O. Winstedt 对证各手抄本的结果，则认为《马来纪年》还有另一位原始的记叙者，是一位马六甲廷臣，约在 1535 年完成初稿，Tun Sri Lanang 因此只能说是奉命整理编次者，并非最早撰述者<sup>③</sup>。

<sup>①</sup> 许云樵《译者导言》，许云樵译《马来纪年》，南洋报社有限公司，1954 年，第 1-2 页。

<sup>②</sup> 许云樵《译者导言》，许云樵译《马来纪年》，第 2 页。

<sup>③</sup> 许云樵《译者导言》，许云樵译《马来纪年》，第 2 页。

不管《马来纪年》有多少种抄本，各方学者对于本书的撰述、编修、推广又有多少种说法，至少在大众的共识，本书最初流传的年代，是伴随着马六甲王朝后裔长期对峙葡萄牙殖民者的历史。1511年，葡萄牙侵略者自海上西来，马六甲王朝失去主要领土后，《马来纪年》流传马来世界，亦得力于马六甲王朝君臣后裔，从1535年到1612年一再编修本书。马六甲王朝后裔反抗外人侵略的整整一百年间，Raja Bongsu 以及 Tun Sri Lanang 这些人物对抗外敌同时也还在关注编修《马来纪年》，可见本书在这些人心目不只是一般娱乐大众和消磨时间的读物，更是精神食粮，具有带动国族历史建构的神圣意义。不论《马来纪年》内容含有多少神话性质的夸张描述，这许多故事毕竟都能反映出忠臣遗民美化昔日王朝的感性思维。书中各种情节乃至各种立场论说，或能折射出当时马六甲王朝后裔服膺与认同的各种观念，支撑过他们的抗战意志与民族精神。

按照上述“叙事反映思想”，以现在普遍流行的希勒伯通行本为据，阅读第十五章的“汉丽宝叙事”，会发现所谓“汉丽宝远嫁”其实只是第十五章全篇其中一个情节。但是“汉丽宝远嫁”又是连接着前后故事情节，环环相扣，这些情节也都是“汉丽宝远嫁”的前因和后果。如此，《马来纪年》第十五章即是以“汉丽宝和亲”作为核心情节，再以前后各种故事组成“汉丽宝叙事”整体内容，表述本书对待明朝历史的态度，亦可说是反映了那时马来世界的中国印象与对待态度。

“汉丽宝叙事”的内容，是由不同的情节依照秩序组成：它首先是承接着《马来纪年》先前的说法，把中国和马六甲王朝都说成是希腊“亚历山大皇帝”的后裔，然后才开始说明，中国皇帝是听闻马六甲的大名，所以主动送来国书与名贵礼品，于是马六甲使臣也回访中国，并接受其“首相 Li Po”的接待；接着的叙事，便是说马六甲的使臣进访中国皇宫时，以智慧折服了中国皇帝，中国皇帝感受到马六甲国王权威，想让公主远嫁和亲等等；接下来的故事情节，便是汉丽宝公主带着庞大数目的贵族随从到达马六甲，由马六甲苏丹安排公主皈依伊斯兰教以后双方完婚，而公主的随从侍女们也在皈依伊斯兰教以后聚居“中国山”，落地生根，明朝后裔也就形成马来民族后裔当中的重要民系。在这之后，还有许多传奇情节，包括马六甲使臣随同完成送嫁任务的中国使臣到中国送递国书、使臣乘船被暴风雨吹到渤泥国、渤泥王质疑马六甲国书的文词是否自称中国附庸、渤泥王确定马六甲使臣的否认以后决定向马六

甲称臣、中国皇帝由于接受马六甲使臣太过谦卑的国书用词而遭受天罚患病、中国皇帝为了治好皮肤病派使臣向马六甲国王讨洗脚水，饮用和沐浴马六甲王的洗脚水以后方才痊愈，中国皇帝也因此发誓双方子孙要世代平等互爱<sup>①</sup>。

以《马来纪年》的第二章对照第十五章，《马来纪年》其实很早就提及两国有必要永为亲属。《马来纪年》第二章提到说，马六甲王朝的远祖 Sang Sapurna，原本是驻足在旧港（Palembang）的君王，统治过邻近大片领地，并曾经欣然接受中国皇帝门当户对的提亲，把自己美丽养女 Tanjung Buih 公主远嫁给中国；《马来纪年》宣称这位公主生下的王子，子孙繁衍众多，在马六甲王朝时代，是统治中国的王室<sup>②</sup>。如此一来，在《马来纪年》宣扬的观念，明朝与马六甲关系，一直到汉丽宝和亲，是不能完全视为异族通婚，因为汉丽宝是 Sang Sapurna 干女儿的后代，她身为明朝公主而南下满刺加，等于是回到母系祖辈的故土，出嫁 Sang Sapurna 的直系子孙。

“汉丽宝叙事”一再表达出马来世界自马六甲王朝以后所建构的中国印象，关键在始于十五章最前端的一大段文字。文字先是说：“中国的王听到马六甲王的伟大，便遣使赠王一满船针、绢、金衣、锦织，以及其他地方没有的各种珍奇物品。”<sup>③</sup>然后《马来纪年》还要根据自己最先始祖是“罗马”的“亚历山大大帝”（Iskandar Zulkarnian），以相同历史的想象，指出明朝写给马六甲的国书既会强调两国同种同族，却又语带倨傲态度，是不适当的。这封《马来纪年》记载的“中国国书”在记忆中是如此措辞：“此书信发自天王靴底下，驾临到马六甲王冠冕之上。我们听闻马六甲王很大，所以愿意和满刺加王友爱相亲。这是由于我们也是亚历山大的后代，和马六甲王同族，也在于世界的王没有比我大，我的人民无从统计，现在按照每个家庭取一根针，赠送给你。”<sup>④</sup>如此叙事的首段文字，即在暗示汉丽宝远嫁马六甲阻力不大；严格来说，双方能追溯拥有同样祖先，马六甲王朝后裔所相信的发生过的这场“异国”通婚，就不等于全然是“异族”通婚。但马六甲显然希望兄弟之邦的关系是建立在不论国家大小，不能只让明朝自诩比他国地大人多。所以这段文字叙述之后的故事转折，是说马六甲人民配合使臣回访明朝，每家贡献一颗剥壳硕莪米（Sagu），满满地一船

<sup>①</sup> W.G. Shellabear (usaha). op. cit. hlm. 93-98.

<sup>②</sup> W.G. Shellabear (usaha). op. cit. hlm. 21-22.

<sup>③</sup> W.G. Shellabear (usaha). op. cit. hlm. 93.

<sup>④</sup> W.G. Shellabear (usaha). op. cit. hlm. 93-94.

送给明朝皇帝，希冀明朝皇帝反过来会欣赏马六甲物产富庶，也要天天吃手工剥壳的白米，并且因感受到马六甲人民众多又伟大，考虑着要进一步和马六甲联姻<sup>①</sup>。整篇“汉丽宝叙事”的行文脉络，是一再强调南海诸邦如何欣然待客，欢迎来自明朝的友谊和支持，甚至强调亲上加亲，而又重视诸国平等相互尊重。本书的最终情节继续写道，明朝皇帝由于初时对待马六甲姿态过高，遭受天谴患上皮肤病，等他皮肤病痊愈后，便主动提出双方子孙亲爱平等<sup>②</sup>。

由于《马来纪年》早期的作者和阅读者主要是古代马来世界的读者，受着各种信仰文化的影响，想法不同于现代人，他们可能没有严格分辨历史、传说以及神话的概念。可能对他们来说，《马来纪年》就是他们根据历代口述、传承下来的真实观念。《马来纪年》第十五章的“汉丽宝叙事”，提到了汉丽宝生下了 Paduka Mimat 以后，Paduka Mimat 生下儿子 Paduka Seri Cina，再传孙子 Paduka Ahmad，后者即 Paduka Isap 的生父；《马来纪年》还提到汉丽宝五百随侍人员被令皈依伊斯兰教以后，他们的后裔在马来民族内部传承身世，被称为 biduanda China（中国或华人王室成员后裔）<sup>③</sup>。Paduka 本来就是马来王朝传统至今对待朝内王公大臣的尊称。若果每代人都在约莫 30 岁生下另一代，看来至少 Raja Bongsu 那时代的人会有印象，也还是听说或认识 Paduka Isap 的后人，也知道自己的马来族群里头有些 biduanda China。就“汉丽宝”的许多后裔历代可能参与马来王朝朝政的事实，要说“汉丽宝叙事”的渊源背景完全属于《马来纪年》的虚构，那也不太可能。

尚应注意，马来西亚课本习惯通称为“马六甲王朝”，在《明实录》这部历朝官修编年体史书，或其他明朝人的撰述文献，常是写作“满刺加”。纵观《马来纪年》，本书首段提及的中国赠礼内容，也许最符合《明实录》里头曾经赐给“满刺加”各种物件的记载。《马来纪年》全篇“汉丽宝叙事”的各种故事情节，如果在明朝真有官方记录，也本当收录在《明英宗实录》与《明宪宗实录》；但是明朝史书只是见有满速沙的名字，不曾留下汉丽宝的记载。

在《明太宗实录》最早记录的明朝与满刺加关系，先是在“永乐三年九月癸卯”各条其中有说：“苏门答刺国酋长宰奴里阿必丁、满刺加国酋长拜里迷苏刺、古里国酋长沙米的，俱遣使随奉使

---

<sup>①</sup> W.G. Shellabear (usaha). op. cit. hlm. 94-95.

<sup>②</sup> W.G. Shellabear (usaha). op. cit. hlm. 98.

<sup>③</sup> W.G. Shellabear (usaha). op. cit. hlm. 96.

中官尹庆朝贡，诏俱封为国王，给与印诰，并赐彩币裘衣。”<sup>①</sup>接下去“永乐三年十月壬午”条又说“赐满刺加国《镇国山碑铭》。时其国使者言，其王慕义，愿同中国属郡，岁郊职贡，请封其山为一国之镇。上嘉之，谕礼部臣曰，先王封山川、奠疆域、分宝玉、赐藩镇，所以宠异远人，示无外也。可封其国之西山为镇国之山，立碑其地……”<sup>②</sup>可是这样的记载在《马来纪年》是不存在的，包括马六甲开国国王拜里迷苏刺率妻子带臣民数百人访问中国，还有明朝替马六甲王朝压阻暹罗干扰，也不见记载。《马来纪年》是把马六甲王朝和明朝的建交，推迟到马六甲有能力将周围国家收纳为属国的满速沙统治时期，又以“汉丽宝叙事”作为整段记忆叙述。教人遗憾的是，上述《明太宗实录》“永乐三年十月壬午”条提及了明成祖亲笔御书的《镇国山碑铭》，送交马六甲君臣立于其国境西山，是洋洋洒洒记载碑铭内容全文，后人却至今未能确定原来立碑真正位置，也未见石碑出土。

简要言之，以《明实录》对比《马来纪年》，后者的明朝记忆显然很不完整，又渗入了各种传说与神话。马六甲王朝君臣遗裔在《马来纪年》表达的“汉丽宝叙事”，确实是接受了残留在先辈脑海的明朝印象，可是又是根据他们在历史的现实遭遇演变出各种传说。这些结集在《马来纪年》的故事，在定型以后反过来广泛影响马来群众，于是又逐渐形成马来世界感觉“真实”的集体记忆。换句话说，“汉丽宝叙事”相当程度上反映着马来世界的古代中国印象，表述为马六甲王朝鼎盛时代演变至 Raja Bongsu 时代对待马六甲国家或族群关系的观念。阅读《马来纪年》的“汉丽宝叙事”，要能有多几分谅解与同情马六甲王朝遗裔“国破山河在”的感情。

由于汉丽宝故事广泛流传，讨论“汉丽宝叙事”的关键处也许不在于探讨汉丽宝有无其人，或者讨论其中故事情节真假，重点也许应考虑《马来纪年》为何如是说。关键在理解《马来纪年》第十五章全篇内涵是宣扬着怎样的态度？既然“汉丽宝叙事”不断在教化读者们应采取何种“对华态度”，而明朝与马六甲的历史关系又不仅仅建构在《马来纪年》的说法，因此，若是能把明史基本史籍《明实录》对照《马来纪年》第十五章，或能注意历史上交往的双方是如何以各自不同的语言文献叙说两套互有出入的历史记忆，呈

<sup>①</sup>【明】杨士奇等纂修《明太宗实录》卷四十六，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微卷影印，第711页。

<sup>②</sup>【明】杨士奇等纂修《明太宗实录》，第723页。

现两种不同文化观念。由此或应采取更高度视野，理解“汉丽宝叙事”之所以流传的背后思想结构。

## 二、《明实录》中“满刺加”海上关系的记叙

早在 1954 年,已故南洋研究学者许云樵最早将《马来纪年》翻译成中文出版,在撰写《马来纪年》译者序言时也曾道:“严格来说,《马来纪年》不成其为史籍,因为它是杂凑传说和神话而成的。”<sup>①</sup>但许云樵更清楚本书“是马来文学作品的精华,是马来民族唯一的文献,它的内容是集一切旧闻和传说,并摘录一切马来文学名著而成的。《马来纪年》的价值,不全在它的史实而在于它的文献地位。……是表现马来民族文化思想的代表作”<sup>②</sup>。许云樵以后的另一篇文章又曾提及:“《马来纪年》(Sejarah Melayu)虽是马来文的唯一史记,但是(里)面夹杂着不少无稽之谈……每一句话都当作真实的历史,那就要闹笑话了。”<sup>③</sup>可是,把《马来纪年》对照明朝历史文献,比较探索其中的思想后,《马来纪年》的内容未必是信史,更应注重它何以演变出历史事实以外的传奇,使得书中传说更有机会广泛流传,成为支撑马来民众共同信念的叙述。又或许,诸多外人觉得内容虚假的历史文学,在探索思想历史的角度而言,反而更能明确地反映集体意识或潜意识的真相。

对照《明英宗实录》与《明宪宗实录》,明朝与马六甲的跨海邦交,在《马来纪年》所谓的满速沙苏丹掌政时代,关系规格达到新阶段。最初,在《明太宗实录》的“永乐九年六月甲申”条,曾经记载“满刺加国王率其妻子及陪臣五百四十余人入朝……命礼部赐王金绣袈衣二袭,麒麟衣一袭”<sup>④</sup>;把《明太宗实录》这段文字相比《明英宗实录》,按明朝礼制,明英宗时代显然给予马六甲苏丹更高的待遇。“正统十年三月壬寅”条记载,壬寅当天,“满刺加国使臣谟者那等,奏请赐国王息力八密息瓦儿丢八沙护国敕书,及蟒龙衣服、伞盖,庶仗天威,以服国人之心。又云,国王欲躬亲来朝,所带人物数多,乞赐一巨舟以便往来,上命所司造与之。”<sup>⑤</sup>由

<sup>①</sup> 许云樵译《马来纪年》,第 52 页。

<sup>②</sup> 许云樵译《马来纪年》,第 53 页。

<sup>③</sup> 许云樵《马来亚丛谈》,青年书局出版,1961 年,第 183 页。

<sup>④</sup> 【明】杨士奇等纂修《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一十七,第 1499 页。

<sup>⑤</sup> 【明】陈文等纂修《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一十七,第 2547-2548 页。

此可知，马六甲开国初年，自明成祖封国，马六甲国王于永乐九年（1411），已经穿上成祖赐赠的麒麟衣；三十余年后，其子孙在正统十年（1445）要求明英宗赐蟒龙衣，获得同意，双方由祖辈关系形成的“父子之邦，兄弟之国”，成就已然升格。

然后在《明英宗实录》里，满速沙名字最初在 1459 年正式出现，是在“天顺三年六月戊午”条，记载了“满刺加国王子苏丹芒速沙遣使来朝”<sup>①</sup>，把这条文字联系两个月后的“天顺三年八月丙寅”条，即可理解满速沙以王子身份遣使明朝，可能是依循明代诸藩报丧待封故例。“天顺三年八月丙寅”条的文字内容说：“遣给事中陈嘉猷为正使，行人彭盛为副使，持节封故满刺加国王子苏丹芒速沙为满刺加国王，赐敕谕王曰：尔先世恪守藩邦，传及尔父，继承未久，遽然长逝，讣音远至，轸于朕怀。尔为嫡嗣，乃能遣使，以方物来献，请命于朝，眷惟象贤，宜绍国统，特遣使赍诏封尔为满刺加国王，仍赐彩币用答勤意；尚其永坚臣节，益顺天心，用修藩屏之恭，毋怠抚绥之政，庶承先志，以享安荣，钦哉。复命嘉猷等谕祭其国王速鲁檀无答佛哪沙，并颁诏告其国人。”<sup>②</sup>

若按 1461 年的“天顺五年三月戊午”条，明朝在 1459 年决定册封满速沙的使节团并非是个小队伍。这次出使团队为了出海，特地前往广东造船，当他们出海半途船沉，得救后回到广东。他们修好新船后，也不能即刻依靠当年或明年的季候风再次扬帆，还得花费时日补充齐备封赐赠物品，重新出海。“天顺五年三月戊午”条记载详情说：“礼部尚书石瑄奏：先是遣礼科给事中陈嘉猷，行人司行人彭盛为正副使，往满刺加国行册封礼，于广东布政司造船浮海，行二日至乌猪等洋遇飓风，船破漂荡六日至海南卫清澜守御千户所地方，得船来救。嘉猷等捧诏书敕书登岸，令水手打捞得纒丝等物，俱水湿有迹，乞行广东布政司收买应付。其纒丝、罗布，宜于内承运库换给，遣人赍付；嘉猷仍往行礼，从之。”<sup>③</sup>如此一来，从礼部上奏，再到使节重新出海册封马六甲新王，前后折腾了二十一个月，方得以重新筹备各种名贵物品。可见明朝重视马六甲，使节团人多物众。

之后多年，除了《明宪宗实录》“成化四年冬十月甲辰”条提到满刺加头目八刺思和通事无沙来朝，获得赏赐，一直到 1469 年“成

<sup>①</sup>【明】陈文等纂修《明英宗实录》，卷三百零四，第 6425 页。

<sup>②</sup>【明】陈文等纂修《明英宗实录》，第 6451-6452 页。

<sup>③</sup>【明】陈文等纂修《明英宗实录》，第 6729-6730 页。

化五年三月戊戌”条，方才再有提到：“满刺加国王满速沙儿，遣使臣端亚妈刺的那答等，奉表来朝谢恩，贡方物。赐宴，并彩段、衣服等物有差，仍命赍敕及彩段等物归赐其王及妃。”<sup>①</sup>而《明宪宗实录》的“成化十一年五月甲寅”条，也如六年前的记载，提到明朝封赐马六甲，是对马六甲入贡礼尚往来，报答友好：“满刺加国遣正副使端马密等，进金叶表文，并象、马、火鸡、白鸚鵡、金钱豹等物，赐宴及袭衣、彩段表里，并以彩段、纱、罗锦归赐其国王及王妃王子有差。仍令赍敕谕国王苏丹茫速沙曰：比者，朝廷遣给事中等官往占城，为风飘至尔国，王遣人供馈，备悉诚意，兹因使臣回便，特赐王彩段二表里，用示褒答，至可领之。”<sup>②</sup>

可是满速沙这次派人入贡，却是源于安南侵占占城，导致明朝前往占城的使节困，不愿无功而返，转而将随船货物运往马六甲交易，并劝请满速沙入朝。“成化十年十二月乙未”条说道：“工科右给事中陈峻等使占城，不果入而还，以原领诏敕及镀金银印、彩段等物进缴。初，峻等使占城，封国王槃罗茶悦，航海至占城新洲港口，守者拒不容进，译知其地为安南所据，而占城王避之灵山。既而之灵山，则知槃罗茶悦举家为安南所虏，而占城之地已改为交南州矣。峻等遂不敢入。然其所赍载私货及挟带口人数多，遂假以遭风为由，越境至满刺加国交易，且诱其王遣使入贡，至是归奏安南占据占城，具奏满刺加国王以薪米供馈，礼意甚备。事下所司，礼部言宜候满刺加入贡使还，降敕奖谕其王。”<sup>③</sup>所以，这是 1474 年说好的入贡，在五个月内实现。

对照马六甲土地上留下的满速沙墓碑等证据，满速沙早在 1477 年离世。《明宪宗实录》在 1481 年最后一次再提到满速沙，是为了马六甲新王就位：“成化十七年秋七月辛丑”条，记载说：“遣礼科给事中林荣充正使，行人司行人黄乾亨充副使，封满刺加国故王苏丹茫速沙子马哈木沙为国王。”<sup>④</sup>根据上述明朝两位帝王统治时代的文献，明朝处理马六甲事务，正如对待其他南海邦国，关键用词是以大陆的“朝廷”、“礼部”去相对于南海的“诸邦”、“国王”行事，朝见马六甲国王的正使，是由奉旨稽查和纠察各部门实务的“给事中”担任，其官阶虽只是七品官，却有面圣谏议的职

①【明】刘吉等纂修《明宪宗实录》卷六十五，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微卷影印，第 1315 页。

②【明】刘吉等纂修《明宪宗实录》，第 2624-2625 页。

③【明】刘吉等纂修《明宪宗实录》，第 2553-2554 页。

④【明】刘吉等纂修《明宪宗实录》，第 3767 页。

权，在负担出使重任时，往往由来自行人司的副使配合同行，负责册封新任藩王，或祭祀已故藩王。所谓“行人”的工作，就是以皇室名义，代表颁行诏敕、册封宗室、抚谕四方、征聘贤才，以及赏赐、慰问、赈济、军务、祭祀。正如上述《明英宗实录》的“天顺三年八月丙寅”条，英宗传达给满速沙的敕谕以及赠礼，反映着大明王朝对待马六甲等国的“请命于朝，眷惟象贤，宜绍国统”，不止一纸文书，而是要有“仍赐彩币”等主动的善意回应，并以遣使庆其登基也不忘祭祀其故王先父，并颁告其国人，表示支持国势强盛的义务<sup>①</sup>。而赠礼作为实质的亲善表达，往往是随着明朝使臣到达当地，或附交马六甲使臣在回程中带回，其中也有“王妃”的礼赠。在这里，国王之妻子称“王妃”而不以“后”称，亦可见明朝把称呼王爷配偶的礼制延续到马六甲。当然。“王妃”也很可能是个复数的统称，涉及正妃、侧妃。

再看《马来纪年》记载的传说，是说汉丽宝是从中国启程，由马六甲使臣 Tun Parapati Puti 护送到马六甲；而护送她的官员 Di Bo 等人，在陪着汉丽宝到达马六甲以后，则是等待着西南季候风汛，再带上满速沙使臣 Tun Telani 与 Jana Putra 等人回航中华。纵观《明实录》里头的满刺加记录，在满速沙时代，也确有马六甲使节两年中连续两次到华的记载，即 1468 年满刺加头目八刺思和通事无沙到朝，以及 1469 年“满刺加国王满速沙儿，遣使臣端亚妈刺的那查等，奉表来朝谢恩”，而 Parapati 的发音也确实相近“八刺思”。《马来纪年》有汉丽宝公主之说，是否可能即是本源于这两年海上通使的壮观局面，以封赐国王及其华裔王妃的事迹作为蓝本？这或值得大胆假设，以求证引路。

### 三、《马来纪年》对明朝远洋邦交的话语重构

正由于汉丽宝是明朝典籍未曾提及的人物，而且明朝派出使节的情况也不可能按照《马来纪年》的叙述，偏离国朝礼制，因此长期以来，屡有史家论说汉丽宝事迹子虚乌有。但是在马六甲，王室通婚华人不是没有的事。英国人巴素撰写《马来亚华侨史》，转引过葡萄牙人 1511 年占领马六甲最高长官的私生子阿伯奎的记载，提及马六甲第二任国王 Megat Iskandar Shah（1414-1424）曾经迎娶一

<sup>①</sup>【明】陈文等纂修《明英宗实录》卷三百零六，第 6451-6452 页。

位华人甲必丹（船队首领）女儿<sup>①</sup>。所以，过去曾有新加坡学者引用这则文字，认为婚事可以反映华人船商在当地的地位，以为汉丽宝公主本有原型是马六甲流传故事逐渐演变，把两位苏丹娶汉人妻子的故事张冠李戴。然而《马来纪年》作者在汉丽宝事迹以外，具体提及汉丽宝数代子孙，还能如数家珍，说明作者与同时代的周围人物，都能熟悉这些名字，或就是他们的长辈。因此，要说“汉丽宝”的传闻是被夸大了生平事迹，会有说服力；但若说故事蓝本人物会被另一年代人物张冠李戴，反而可能性较小。

若按陈志明的推测，他认为苏丹满速沙可能婚娶了明朝皇帝送来的一位华人女子，但不一定是一位公主；同时，他也认为汉丽宝随行人员的记载可能是为着夸示苏丹荣耀，未必真是如此众多<sup>②</sup>。美中不足的是，不论在明代的《明实录》或后来清代张廷玉编修的《明史》，都没有记录明朝皇帝曾赐婚女和亲满刺加国王。值得注意的是许云樵 1954 年初版《马来纪年》最早中译本的注释，里头早注意到《马来纪年》的所谓“首相李宝”应是“礼部大臣”之讹，并指出莱佛士 1812 年版是把 Li Po 和 Di Po 全翻译成 Ling Ho，而不似后来希勒伯的 1909 年刊本，把 Li Po 和 Di Po 分成两人；另外，许云樵亦提醒读者，莱佛士版本里头没有“汉丽宝”，是把“中国皇帝女儿”称为“Heng Liu”<sup>③</sup>。再考虑到 putri 至今不论在印尼语或马来语都适用在通称妙龄女儿，是带着尊称意味的昵称方式，亦概指一切王室郡主，不一定是指公主；因此，所谓“Putri Hang Li Po”的原型，关键在 putri 原意是否指当地有过“礼部”封赐郡主或少女？这个女子源自汉族，有着王妃之尊，所以受明朝封赐，后人想象其出身之贵，因而把南海的明朝女子说是源自明朝宫廷，也是有可能。

如先前的讨论，《马来纪年》当初传播汉丽宝故事，是能例举那时王国众臣熟悉的人物，说明哪些人是汉丽宝四代以来世袭子孙，可见汉丽宝传说背后当有历史渊源。可是却随着时过境迁，记忆演变不一定是事实，却是普遍符合大众心理要求的流行叙事。

某些学者基于推动马中友谊，主观上也许特别关注《马来纪年》里汉丽宝的故事，强调传说有过跨海联姻，对马中两国都有正面意义，因此会设法解释故事脉络的内在思想结构。例如中国的孔

<sup>①</sup> Purcell, Victor. *The Chinese in Malay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20.

<sup>②</sup> Tan Chee Beng. *The Baba of Melaka: Culture and Identity of A Chinese Peranakan Community in Malaysia*. Petaling Jaya: Pelanduk Publications. 1988, p.30.

<sup>③</sup> 许云樵《马来纪年（上卷）》，许云樵译《马来纪年》，第 167 页。

远志，在 1999 年 5 月至 2000 年 5 月受聘马来亚大学客座教授，期间曾在 2000 年发表评论汉丽宝传说的马来文论文，强调两个观点：第一，认为通婚说法反映两国关系源远流长；第二，由此证明早在 15 世纪即已经存在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异族联姻的现象<sup>①</sup>。孔远志 2001 年发表的另一篇马来文论文提到：“《马来纪年》里头述说汉丽宝是中国公主，所隐藏的意义，是说明中国与马来人王室不止在马六甲拥有政治与经济上的紧密联系，另外还有血缘姻亲关系；此外，这内中也意含马六甲作为领土较小的王国，意欲与中国这个 15 世纪在东南亚、南亚、东非极高权势国度结亲的原因。其中一个隐藏的意义，是通过和中国结盟，避开暹罗对马六甲的侵犯。”<sup>②</sup>

可是研究一份文献，重点不一定是为了考据文中描述的情节和事物存在与否，更有必要考虑文献所由来的时代与环境，思考其整体行文脉络到底表述怎样的思想观念，如此才能理解作者行文方式以及文献何以如此表达内容。尚且，讨论同时代涉及两个以上国家的议题，亦不可能单以其中一方的有限文件论说。从《马来纪年》出现的时代去说，《马来纪年》是以大量神话和传说支撑马六甲昔日辉煌的想法，激励人心；而《马来纪年》的流传，却偏是发生在马六甲城池 1511 年被葡萄牙人侵占之后，大众目睹着荷兰人等西方殖民者继着葡萄牙人之后，络绎不绝接踵而来。而且，满速沙驾崩以后，明朝和马六甲关系也非一成不变。明朝由明宪宗晚期到明武宗时代，一再自顾不暇，对于外敌侵略马六甲，总是动口不动手，让马六甲国家危亡留下遗憾。以《明实录》、《明史》的记载，对照《马来纪年》的历史记忆想象，是可能看到马六甲王朝后裔很是眷恋明朝关系，同时也表述着他们对明朝的认识变化，以及企图重新诠释历史有过的相互关系。

《明宪宗实录》“成化十七年秋七月辛丑”条提到两位使者前往马六甲册封已故满速沙继承人，马六甲派遣正副使端亚妈刺那查等人其实也在奔赴中国途中；所以接下去“成化十七年秋八月乙巳”条记载明朝廷在当日宴请使臣的事迹：“仍以织金、彩段、文锦等物，付使臣归赐其国王及妃”<sup>③</sup>，而端亚妈刺的那查等“乞赐冠

<sup>①</sup> Kong Yuanzhi. *Pelayaran Zheng He dan Alam Melayu*. Bangi: Penerbit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2000, hlm.82.

<sup>②</sup> Kong Yuanzhi. *Cerita Hang Li Po: Ode Persahabatan Kedua-dua Bangsa China-Malaysia.in Sari 19*. Bangi: Institut Alam dan Tamadun Melayu.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2001, hlm.184.

<sup>③</sup> 【明】刘吉等纂修《明宪宗实录》卷二百一十八，第 3769 页。

带”，也得到明朝同意<sup>①</sup>。但端亚妈刺的那查等人入贡要求明朝赐予冠带，目的显实是要求明朝助力，为安南欺凌马六甲主持公道。接下去“成化十七年秋九月壬申朔”条，内容即说：“满刺加国使臣端亚妈刺的那查等奏：成化五年，本国使臣微者然那入贡还，至当洋被风漂至安南国，微者然那与其僉从俱为其国所杀，其余黥为官奴，而幼者皆为所害。又言安南据占城城池，欲并吞满刺加之地，本国以皆为王臣未敢兴兵与战。适安南使臣亦来朝，端亚妈刺的那查乞与廷辩。”<sup>②</sup>

只是，明朝的态度也许会让马六甲人失望，因为同一则文字接下去是说：“兵部尚书陈钺以为，此已往事，不必深校，宜戒其将来。上乃因安南使臣还，谕其王黎灏曰：尔国与满刺加俱奉正朔，宜修睦结好，藩屏王室，岂可自恃富强，以干国典，以贪天祸。满刺加使臣所奏，朝廷虽未轻信，尔亦宜省躬思咎，畏天守法，自保其国。复谕满刺加使臣曰：自古圣王之驭四夷，不追咎于既往，安南果复侵陵尔国，宜训练士马以御之。”<sup>③</sup>

这时明朝对外关系官员的行为态度勤忧。随着马六甲声援占城声讨安南，事情并未了结，反而暴露出此前明朝使团的作弊。使团抵达占城，发现明朝要册封的对象遭受政变被杀，反而为着私下在当地互市贸易，擅自册封安南扶持的伪国王，再接下去更是打着朝廷旗号私下到马六甲牟利。《明史·列传第二百一十二·外国五·占城》记载事件始末说：“（成化）十四年，遣使朝贡请封，命给事中冯义、行人张瑾往封之。义等多携私物，既至广东，闻斋亚麻弗菴已死，其弟古来遣使乞封。义等虑空还失利，亟至占城。占城人言，王孙请封之后，即为古来所杀，安南以伪敕立其国人提婆苔为王。义等不俟奏报，辄以印币授提婆苔封之，得所赂黄金百余两，又往满刺加国尽货其私物以归。义至海洋病死。瑾具其事，并上伪敕于朝。”<sup>④</sup>《明宪宗实录》谈到的这位使官的下场：“礼部劾瑾专擅封立，当正典刑，命下锦衣卫狱鞠治，始得其状，法司比依大臣专擅选官罪，坐斩。”<sup>⑤</sup>

明朝虽然屡屡出口干涉，安南与占城的新政权还是一再罔顾，最终明朝必须以军队护送占城流亡国王回国，但毕竟前边发生的领

<sup>①</sup>【明】刘吉等纂修《明宪宗实录》，第3769页。

<sup>②</sup>【明】刘吉等纂修《明宪宗实录》，卷二百一十九，第3785页。

<sup>③</sup>【明】刘吉等纂修《明宪宗实录》，第3785页。

<sup>④</sup>【清】张廷玉等编纂《明史》卷三百二十四，中华书局，1974年，第8388页。

<sup>⑤</sup>【明】刘吉等纂修《明宪宗实录》卷二百二十，第3807页。

土问题，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而明朝讨论南海国事，还发生明朝官员集体张冠李戴，顺道把无关马六甲之事，加罪马六甲之上，而且之后还不曾更正，记诸史书；在西历 1505 年，《明武宗实录》“弘治十八年六月庚午”条载说“给事中任良弼等……如往时给事中林霄之使满刺加，不肯北面屈膝，幽饿而死，而不能往问其罪，君命国体，不可不惜，大抵海外之国无事则废朝贡而自立，有事则假朝贡而请封。”<sup>①</sup>但是，林霄事实上没有去过马六甲，这件事发生在暹罗<sup>②</sup>。无论如何，明朝以兄弟之邦对待马六甲，是不变的关系。再到 1508 年，《明武宗实录》“正德三年十二月辛未”条，又记载“满刺加国王遣副使端亚智，等来朝贡方物，回赐国王蟒衣、彩缎、纱罗、文锦，及赏使人彩缎衣服、绢钞有差。”<sup>③</sup>列举了所有中国送给马六甲国王的贵重物件，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蟒衣。

1511 年，明朝典籍初称“佛郎机”的葡萄牙入侵马六甲，马六甲告急，明朝自己内忧连连，鞭长莫及，吩咐其他藩国救援不果。马六甲王朝都城沦陷，其君臣撤守到周遭领地，领导各属国继续抗葡。《明史·列传第二百一十三·外国六·满刺加》：“后佛郎机强，举兵侵夺其地，王苏丹端妈末出奔，遣使告难。时世宗嗣位，敕责佛郎机，令还其故土。谕暹罗诸国王以救灾恤邻之义，迄无应者，满刺加竟为所灭。时佛郎机亦遣使朝贡请封，抵广东，守臣以其国素不列《王会》，羁其使以闻。诏予方物之直遣归。后改名麻六甲云。”<sup>④</sup>从《明史》看，“满刺加”和“改名麻六甲”似乎变成了两个概念。同一片土地名称，被视为葡人占据地的，是根据葡人发音再翻译成汉字接近闽南语发音的名称；但原来明朝汉语还是把自明成祖年代习惯译称的“满刺加”，认定为一个只是失去原来都城区域的国家名称。马来西亚现在惯用由“麻六甲”而“马六甲”的译音，主要是 1511 年葡人占有都城以后的地理范围。

1520 年《明武宗实录》的“正德十五年十二月己亥”条，可以看出明朝诸大臣对于满刺加求兵救援是有回应的，所以才拒绝葡萄牙“进贡”和“请封”；其中监察御史丘道隆是建议说，葡萄牙吞并的是明朝廷封国领土，若不愿归还满刺加疆土，即应集合各国兵力讨伐；而御史何鳌则声明，不能听任葡萄牙人广东往来贸易，以

<sup>①</sup>【明】费宏等纂修《明武宗实录》卷二，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微卷影印，第 72 页。

<sup>②</sup> 陈学霖《明代人物與史料》，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266-274 页。

<sup>③</sup>【明】费宏等纂修《明武宗实录》卷四十五，第 1026 页。

<sup>④</sup>【清】张廷玉等编纂《明史》卷三百二十五，第 8419 页。

免祸害南方<sup>①</sup>。到 1521 年《明武宗实录》的“正德十六年六月壬寅”条，则继续有提到“满刺加国遣使赍金叶表文及方物来贡。给赏使臣，并回赐国王王妃如例”<sup>②</sup>，可见关系延续。可是依据《明武宗实录》，也可发现明朝诸大臣多不理解葡萄牙人，不知对方没有朝贡概念，也不清楚西人合理殖民理论的逻辑，更不曾思考任凭西人按照自身规范逻辑入侵南海，未来会引起怎样的局势。但明朝虽无从实际上满足马六甲王朝要求援军，在道义上毕竟是一直支持着满刺加，与之贸易，又拒绝“佛郎机”许多要求。特别是葡萄牙人 1519 年借得以接近明武宗，武宗本身对文化有兴趣，专宠佞臣江彬以及葡人华人通事火者亚三，更造成相当尴尬的历史局面；这种情形直至明武宗在正德十六年四月驾崩，才有过一时期的转变<sup>③</sup>。

直至 1522 年，《明世宗实录》的“嘉靖元年秋七月辛巳”条说：“正德间，海夷佛朗机逐满刺加国王苏端妈末而据其地，遣使加必丹木等入贡请封，会满刺加国使者为昔英等亦以贡至，请省谕诸国王及遣将助兵复其国；礼部已议，绝佛朗机，还其贡使。……满刺加求援事宜，请下兵部议。既而兵部议请敕责佛朗机令归满刺加之地，谕暹罗诸夷以救患恤邻之义。其巡海备倭等官，闻夷变不早奏闻，并宜逮问，上皆从之。”<sup>④</sup>同一年八月底，明朝驱赶入侵的葡萄牙人，发生屯门海战。“正德十六年八月辛巳”条，明朝官员讨论对朝鲜封藩发生状况，又因着马六甲王朝使者不久前到来，还提及说“今朝廷于诸番国如占城安南及满刺加等处，遇有遣使，皆用翰林官，或给事中行人衔命以往”。可是，这一年的记录，其实是《明实录》里头最后一次出现“满刺加”来朝的记录。往后再出现明皇朝与马六甲王朝关系史的书写，是《马来纪年》改写历史记忆的历史。

在《马来纪年》里头，不见“明朝”的概念，也没有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取而代之，是把马六甲王朝与中国的交往的历史年代往后移，以满速沙扩张王朝领土的最强盛年代为背景，说起中国主动建议邦交，又去掉了《明实录》马六甲控诉安南侵略的历史记忆；而本书整体故事印象，毕竟是要先说明中国帝王本源自巨港国王干

<sup>①</sup>【明】徐阶、张居正等纂修《明世宗实录》卷三，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微卷影印，第 115-152 页。

<sup>②</sup>【明】徐阶、张居正等纂修《明世宗实录》，第 115-152 页。

<sup>③</sup>金国平、吴志良《一个以华人担任大使的葡萄牙使团——皮来资和火者亚三新考》，《行政》第 16 卷第 2 期（总 60 期），澳门公职局，2003 年，第 465-483 页。

<sup>④</sup>【明】徐阶、张居正等纂修《明世宗实录》卷五，第 211 页。

女儿的血缘，再解释巨港国王后人如何演变为马六甲王朝嫡系，由此阐述马六甲王朝统治者缘于“亚历山大”子孙的高贵血统，与明朝皇室建交通婚并非任何一方高攀，也不能说是“异族通婚”。

可圈可点的是，《马来纪年》关于汉丽宝一章，几可反映马六甲也知道中华对待海上邦交本曾拥有“父子之国，兄弟之邦”的常用说法，但又想透过传奇故事去重新诠释马六甲一贯用汉字书写给明朝的国书内容。文中提到 Tun Telani 与 Jana Putra 等人陪同中国使臣回华，半途到渤泥国避风，渤泥国王问及“满刺加国王给中国国王的信，是何体裁？”，Tun Telani 回答国书内容是“仆（臣），满刺加国王，拜上吾父中国国王”，引发渤泥国王疑问“拜上”（sembah）的意义是否经已表示马六甲是中国附庸？当时 Tun Telani 沉默不语，而由着 Jana Putra 解释说，“Sahaja”一词在当时马来古语固然是指奴婢（hamba）<sup>①</sup>，但是若把文字按马来语法排列，“Sahaya Raja Melaca dulang Kapada Paduka Aya Handa Raja Cina”的意思应被理解为“满刺加王的奴仆，敬拜上吾父中国之王”；如此，国书内容就意味使节用词不等于国王个人“拜上”明朝帝王<sup>②</sup>。满刺加女婿本当称明朝岳父“父皇”也不为过，但《马来纪年》则对于国与国之间要求对等的心理，也有一番解说。

《马来纪年》的历史想象不仅建构汉丽宝传说，以此改写马六甲与明朝关系。它除了把双方关系推迟到满速沙时代去开始，它又是以建构的神话否定双方海上国书的内容与体例，要求相互平等地位。汉丽宝的叙事神话是说，当中国皇帝阅读马六甲国书尊称他“父皇”，一度满心欢喜，可是没过两天就全身发痒，御医无策，只有一个老医师应诏上奏，说这皮肤病来自上天降罪，不能以常药医治，必须喝了满速沙的洗脚水才有希望痊愈，于是明朝君王就派遣使臣到马六甲向满速沙要洗脚水，取回中国皇宫给皇帝沐浴和饮用。《马来纪年》记载汉丽宝传说的这一章，是以这一则神话作为了结，诠释马六甲的立场，更期盼双方是兄弟之邦而非父子之国。这一章最尾的段落述说：中国皇帝喝过马六甲苏丹洗脚水痊愈以后，从此誓约明朝不再居高临下，不想要马六甲苏丹和子孙再使用

<sup>①</sup> 从琉球《历代宝案》第一集卷二，可以发现满刺加水师领导“乐作麻拿”（Laksamana），使用明朝“成化”年号，以及以中华农历计日，用以自称的汉字词汇则是“奴婢”。

<sup>②</sup> W.G. Shellabear (usaha). op.cit. hlm. 165-166.

“拜上”的语气对待中国，只希望双边子子孙孙能世世代代血统相亲，互有共识而相亲相爱<sup>①</sup>。

#### 四、文人断章取义与再想象的历史叙事

虽说“汉丽宝叙事”源自《马来纪年》，可是上世纪以来在华人世界流传的“汉丽宝叙事”，却不见得源于华文世界的读者直接阅读《马来纪年》的结果。相反的，在华文世界流传的汉丽宝故事各版本，多是有着以《马来纪年》作为底本重新建构叙事的痕迹，朝向各种从主观设想的“亲善”描述，却可能和《马来纪年》原文的思想脉络有所出入。这可以追溯至 1950 年代中叶后，那时的英国殖民部正准备撤离，并帮助原来殖民地规范独立建国的内容，马来亚教育政策，强调“马来亚化”的华文学校课本，内容既要保持华人文化教育，又得倾向表述华人社会乐意接受族群间的“融合”；这套政策思维落实在华文小学历史课文，居然是把满速沙迎娶汉丽宝的故事当成正史，编成课文。但课文的一些说法又超出《马来纪年》原来记载。自那时起，汉语版的汉丽宝故事，虽说和《马来纪年》原来内容有出入，却是以课本为载体，走进小学生幼小的心灵，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家喻户晓，并在各种媒体继续流传演变出各种版本和说法。

《马来纪年》的内容，本来就较真实的反映出马六甲王朝君臣遗裔的心理，其成书过程，也正在通过汉丽宝传奇当中的各种情节，包括洗脚水神话，逐渐远离王朝先辈原先流传的明朝记忆。按明朝礼部与行人司，使臣到达南海诸国册封国王或宣诏各种事务，如何行礼如仪，本来就有一定规范。但《马来纪年》的作者却不曾在书中记载这许多的细节。“汉丽宝叙事”，作为马来世界在记忆中视为历史的传奇，是一则既诉说前因又指明后果的整体叙事，表达着成书年代一连贯的对华关系再认识。而且，在《马来纪年》中，“中国”的渊源被视为血缘渊源的荣誉性，是可以接受和强调的；而“伊斯兰教”却能进一步成为马六甲王朝视为主体文化的一道文化界线，更清楚让葡荷时代逐渐以以教众为主体的地方社会，识别王朝内部主要的“我们”和参与的“他者”。所以，在《马来纪年》，满速沙迎娶汉丽宝的先决条件，是她得成为穆斯林；然

---

<sup>①</sup> W.G. Shellabear (usaha). op.cit. hlm. 166-167.

后，公主的五百侍从也被要求皈依。再然后，这些迁居到马六甲的新进穆斯林集体聚住的地方就叫“中国山”（Bukit China），他们在当地掘井建村，生下后代被称为“biduanda China”（中国或华人孩子）。在当代马来西亚的现实当中，我们至今还可以体会《马来纪年》成书以来，相同思路在马来亚半岛的影响源远流长，信奉伊斯兰教至今构成马来半岛地区历史以来定义“马来人”的要素，乃至是马国宪法承认马来人身份的一道门槛。

可是，正如上述所说，汉丽宝历史传说后来会在中文圈子广泛传播，以至其故事在中文世界有着另外的定型，却是牵涉着当地华人在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间被鼓励“本土化”的认知。只是这些中文版本的叙事，往往是消解掉《马来纪年》有关转移文化认同与文明归宿的那些部分。而且，当课本把这一切视如真实的事迹，居然还进一步牵涉到所谓“峇峇”与“娘惹”的历史来源，这不能不说是旅游业制造故事的猎奇需要。上述情境，当然涉及当时马国华人文教界面临的新形势。那时马来亚华人普遍强调维护祖先参与开拓本土的成果，固然乐意配合执政者提倡马来亚中文教育乃至全体华人社会的“马来亚化”，可是各方如何诠释所谓“马来亚化”，方向经常会受到英国顾问官员和种族主义者的干扰，所以华人社会不时会针对课文内容有所争议，甚至内部也有意见分歧，在争取与妥协之间摇摆<sup>①</sup>。结果，部分马来亚华人文教界掌握着编写历史课本的工作，其认识却不见得渊博，也不见得拥有保护话语权的概念，而是单纯只想到鼓励族群亲善，对汉丽宝“和亲”推波助澜；再遇上本该严格的历史学术的缺席，原本《明史》到各种中西文献的对证缺席于编写课本的考虑，卒之中文版的“汉丽宝叙事”，又是按照编写者的认知，构成数代人学习历史的课文内容。

进一步从当代历史进程讨论中文版本“汉丽宝叙事”定型于马来亚历史课本的时代背景，此时正值 1950 年代，正当英国殖民政府重新定位其亚洲角色之际。英国作为马来亚原来的宗主国，当时正在推动新制定的“东南亚区域战略”概念，目标包括替英属马来亚联邦设计由自治到独立的蓝图，确保新兴国家不再成为英国负担，同时又是加入英共和联邦，将来维护英国在本区域最大程度利益。当时英国殖民政府为马来亚和新加坡编订独立后的初中历史课本教导说，英国人是在 1946 年决定，由总督咨询马来人政党巫统，为马

<sup>①</sup> 林连玉《课程委员会杂掇》，《风雨十八年》，林连玉基金会，1998 年，第 149-159 页。

来亚设计新国家宪法，又在 1948 年后开始把海峡殖民地的马六甲和槟榔屿纳入马来西亚联邦行政，派驻最高专员管理。另外再派驻总督管理新加坡与圣诞岛等岛屿，而在上边以“东南亚”的概念，以新设的“东南亚总署专员”（Commissioner General）取代原来的总督，并确定只有“正确的人”（The right people）可以获得联邦公民权<sup>①</sup>。在英国殖民政府扶植马来西亚独立的过程中，主流态度设想着承认当地存在一个“马来人”共同体，是以伊斯兰教而非族群或血缘作为认同基础，应以信仰伊斯兰教以及拥有土著特权作为界定共同体身份的基本条件；但是，这套设计同时也得承认眼前多元文化的现状，面对各族保护身份认同的意愿，其后果就是留下朝野至今争议的文化教育政策议题——最终是否要朝向单一语言教育，悬而未解<sup>②</sup>。有了英国殖民者对上层设计的影响，产生了这样的氛围，马来西亚在 1957 年独立以后，其华文学校规定小学自四年级开始方才上历史课，而课本上说明“本书是遵照马来西亚联合邦 1958 年颁布之小学历史课程标准编订”<sup>③</sup>，显是相应于上层设计的思路，在现实中又得承认中文教育继续存在，同时则要求课程“马来亚化”。那时的编写课本，包括将汉丽宝事迹当成小学生学历史的入门，所要叙述的内容，其实都必须符合着政策的思考，才可能出现在学校课堂。

各地华文小学，在二战前原来使用过中国课本上课，到马来西亚在 1957 年 8 月 31 日独立以后，大到 1959 年年尾，开始使用统一课程的新课本；在四年级《历史》上册，共有 18 课，第 13 课便是《满速·沙与汉·李宝》<sup>④</sup>。这篇历史课文很明显的既有遵循着当时政策的痕迹，也反映了马来族和华族从各自角度希望强调传统情谊关系的需要；其内文是折衷着《明英宗实录》说马六甲王朝派使者到中国的说法，又不会强调那是从《明实录》立场说的请封，而是把笔锋一转，下一句就接到“汉丽宝叙事”上边。课文首段文字带给小朋友的印象是：

---

<sup>①</sup> Philip N. Nazareth. *Malayan Story*.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58, p.58.  
<sup>②</sup> 郑良树《独立后华文教育》，林水椽、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二册，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 年，第 255-288 页。  
<sup>③</sup> 马来西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编辑委员会《马来西亚联合邦华文小学课本·历史（四上）》，马来西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60 年（修订版），封面内页。  
<sup>④</sup> 马来西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编辑委员会《马来西亚联合邦华文小学课本·历史（四上）》，第 38-40 页。

满速·沙是个英明的国王，在他做国王的时代，马六甲很是强盛。那时，马六甲曾经派了使者向中国致敬。中国的皇帝为了加强两国的友谊，便把一个叫汉·李宝（Hang Li Po）的公主嫁给满速·沙，并派了一位使者带了五百名宫女护送公主到马六甲来。<sup>①</sup>

课文接下去又说，当时华人口颇为集中的雪兰莪州，最早的国王（*raja*，课文采用译音“拉渣”），也是缘起于汉丽宝后裔领导当地的政权演变：“汉·李宝到马六甲后，满速·沙非常喜欢，亲自到码头上去迎接。后来，满速·沙和汉·李宝结婚，生了一个儿子，名字叫米玛（*Mimat*），米玛长大后，被封到雪兰莪令吉河旁的奇兰（*Jeram*）去做拉渣。”<sup>②</sup>

有趣的是，这时的历史课本全然不提明朝使者尹庆或郑和访问马六甲，反而在第十一课提到五百多年前彭亨国王“把信写在金叶上，令使者带到中国致敬。中国也派了三宝太监郑和到彭亨来，联络两国的感情”<sup>③</sup>，但先前又说彭亨“到五百年与马六甲合并，成为马六甲的属国”<sup>④</sup>。这个说法结合着第十三课的内容，极易给学生造成印象错觉，以为明朝与中国建交是在满刺加兼并彭亨以后。第十三课的最后一段，可谓神来之笔：“那时候在马来亚已有很多华侨，这些华侨在本地所生的后代，叫做峇峇。峇峇除使用中国姓名，保留中国的旧有风俗外，在生活上语言上已经和马来人同化了。”<sup>⑤</sup>这段相互矛盾的文字，不知是否源于马来亚生活几代人的一些峇峇的自我认定，而如今被搬到课文上？可是，这一类不够周详的文字，后来又使能够随着课文教育的影响，潜移默化整整几代人的历史认知，偏差了认识真相的入门。

物质条件决定精神，物质条件与其造就的思想模式，会影响着生活方式的取向。从实证而言，峇峇社群的生活方式虽说与一般华

---

<sup>①</sup> 马来西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编辑委员会《马来亚联邦华文小学课本·历史（四上）》，第38页。

<sup>②</sup> 马来西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编辑委员会《马来亚联邦华文小学课本·历史（四上）》，第39页。

<sup>③</sup> 马来西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编辑委员会《马来亚联邦华文小学课本·历史（四上）》，第33页。

<sup>④</sup> 马来西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编辑委员会《马来亚联邦华文小学课本·历史（四上）》，第33页。

<sup>⑤</sup> 马来西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编辑委员会《马来亚联邦华文小学课本·历史（四上）》，第39页。

人有别，可是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是在相同的祠堂祭祀祖先，墓碑也和其他人一样往往是记载着中华祖籍的乡社名称，他们的名字也出现在同一本族谱，只是他们趋向享有其他族群上层而不是下层百姓衣食住行上的生活方式，这到底是不是更应该解释成为“阶级现象”？尚且，他们家门还是流行贴对联、在大厅上继续供奉中华神明以及供奉祖先牌位，晨昏都得上香，逢年过节也要上坟祭祖，更不忘在墓碑以中文刻写原乡名称乃至祖辈姓名，而后辈则流行年年清明替墓碑字体上漆，方便子孙辨认，这显然和《马来纪年》原文上记载“biduanda China”后裔，差别很大。何况，很多峇峇家里不单说马来语，毕竟由于他们的时代还没有任何汉语“国语”，所以他们亲友间会使用祖先籍贯的汉字方言，跨越籍贯的沟通则有借助英文和马来词汇的方便。由此可论，课文所谓“峇峇”的“同化”，毕竟不是信仰、思维，或者种族认同受到“同化”。他们既然能够保留中华旧有风俗习惯，并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家中大事更遵从中华文化，又怎能说族群生活上已经被马来人同化？“同化”用字是否妥当，是值得商榷的。

自那个时代起，小学课文内容，把自明代已经居住当地的“峇峇”群体，联系到华人文人自身的汉丽宝“和亲”想象，以及强调他们的马来化，可能未曾注意其双刃剑效果。自那之后，大家较忽略许多峇峇家族，例如马六甲的陈祯禄、檳城的辜鸿铭，祖辈以来都曾有所谓“唐山”的习俗，反而侧重强调他们家人的“马来化”。自1960年代，从汉丽宝到“峇峇”的说法，也一再被有心人借用，用来支持极端主张，主张以“峇峇”群体的存在证明华人可以被“同化”，华人应逐步接受融合或者接受彻底同化。

陈志明在一篇英文论文提及过：“在某些人的想法，包括在土生华人自己的圈子里头，都相信他们是汉丽宝和满速沙和亲的后人。”<sup>①</sup>这样的想法，也许产生自华人社会，把自己祖先身份抬高，说成是陪伴公主和亲的大臣子弟随从，但这和《马来纪年》记载真正“biduanda China”的宗教抉择，并不一致。要是从父系传承的习俗去说，以为自己是公主和亲成员的后人，之所以是无稽之谈，就在于说这话的人没有真正细读《马来纪年》，不懂得《马来纪年》所谓随着公主前来的“Dayang-dayang”，在马来文或印尼文意即少女或侍女，他们的后裔不应是有父系的宗姓渊源。

---

<sup>①</sup> Tan Chee Beng. *Chinese Peranakan Heritage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Kuala Lumpur: Vivar Printing Sdn. Bhd.1993, p. 61.

回归《马来纪年》本身，书中并没有“峇峇”的概念，书中提到的“biduanda China”，毕竟是马来族群的一种内部群体，特点虽是拥有华人血统，信仰生活上却是彻底的当地伊斯兰教徒。所以，《马来纪年》提到的“biduanda China”，不应受到进一步主观想象，以为峇峇社会婚庆丧礼在模仿前明礼俗，就说是“biduanda China”的后裔。可是 1950 年代灌输给学生的历史认知毕竟影响太大。马来亚华人社会乃至现在为了迎接两岸游客的说法，流传着的华人版本的“汉丽宝叙事”，以为汉丽宝带来的随从后裔是“峇峇”，无疑带有 1950 年代末小学历史课本的印象痕迹，课文带来给上几代人印象影响，又是在《马来纪年》的历史想象上边另外建构华人自己的历史想象。

## 结论

1511 年，葡萄牙入侵马六甲，标志着不论中华或南海史无前例的变化，西方人与他们的意识形态第一次控制马六甲海峡航道，大明江山第一次在海上被西人打开缺口。这是历经梁、隋、唐、宋、元、明以来，旧有的丝路模式与国家关系第一次备受严峻挑战，遇上另一类国际关系与经贸方式从思维到范式。各国通用大明通宝、以汉语为官方来往文字的历史，卒之演变为通用西洋银元，成就至今许多人崇尚西语的“东南亚”。不幸的是，当时明朝内政自顾不暇，满刺加的求援鞭长莫及，预测不到往后的发展，让历史终成历史。

自满速沙统治马六甲的时代，明朝经历过土木堡之变，经历着英宗复位、于谦被诬处死，再到英宗子宪宗为于谦平反，却重用汪直指挥西厂，国朝命运可谓起伏多变。即使如此，明朝在同时期若真有公主远嫁南海藩国，或有任何女子受赐予“郡主”名号出嫁，那是一件大事，史书当有痕迹。可是明朝文献，至今无从发现可以比附或演绎马六甲和亲记载的蛛丝马迹。思考《马来纪年》为何会出现这种想象，而不是别样想象，也是本文一再反省的目标。

当明朝尽其努力，也无法再如同过去回应马六甲历代国王对它的热烈寄望，纵然有朝臣一再指出葡人侵略之害，却无法以中华朝廷的实质力量支持马六甲免遭侵略的独立自主，《马来纪年》或许就是反映着马六甲王朝失去历史以来最重要疆土以后，

调整对待中国的重新认识。马来人大众正在通过“汉丽宝叙事”等传奇或神话，把集体接受的传说当作真实，投射出他们认为两国关系如何才算合理的真正想法。可是，亦如上文所曾指出，“汉丽宝叙事”既然能够说出故事主人翁后代子孙的谱系，也可以从叙事去比附马来族群当中的 *biduanda China* 群体的祖先渊源，其叙事确可能是以某个特地人物作蓝本，最可能是某位陪同国王接受明朝赏赐的华人王妃。

现在华人文人都把马来爪夷文翻译成“李宝”或“丽宝”，其原文在英语英译是作“Li Po”发音，现代汉语拼音该读作“Li Bo”，或即反映出马六甲王朝后裔对明朝“礼部”的残留印象。

正如上述《明实录》的一些记载，明朝出使的船舰上有时是有商人跟随的，也有一些华人子民在之前或当时在南海诸国形成开拓聚落，甚至由于航船航行主要靠风向，来到马六甲的各地使团或商人要妥当集散和处理手上大量货物，都得要等待风汛，数月以后才回航。这其中有许多人为了照顾自己在当地生活，更需要管理自身在当地的商铺和存库，在当地娶妻生子不足为奇。

《马来纪年》和《明太宗实录》的记载，互相对于马六甲王朝使者随着明朝使团舰队回访中国，都是有记忆的。不同的是《马来纪年》把双方的首次来往撰写成为发生在满速沙的时代，同时《马来纪年》记载 *biduanda China* 的来历，也可能发生类似的情况，都是由于重组残留印象形成的集体记忆，混入了族群感受和话语取向。就明朝使节船而言，每一次出行的给事官和行人虽然不是同一个人，但其他文武随员或水军兵吏却可能有重复的人选，因为过去就熟悉往来马六甲水道，才可能被征集出行；*biduanda China* 的身世，或许是这些人的后裔缅怀与歌颂祖先的说法。集体记忆未必等同真实历史，却往往更符合当事人乃至整体马来族群解说内部民系或群体来源的自尊自信。

过去以来，一些马来亚华人文教界前辈，凭着他们知悉中国历代皇朝都发生过“和亲”，大家一再重复创作各种相关“明朝公主汉丽宝”的文学作品，他们的作品最先面对的是华文世界，不一定人人都有居住过马来西亚，也不一定人人都懂马来文，更不可能都是认真阅读《马来纪年》；所以华文书写的各有精彩，确实也逐渐塑造形成中文世界对“汉丽宝”的印象。可是，由此建构的认识，相比马来文读者阅读《马来纪年》“汉丽宝叙事”的脑海印象，是有差距的。何况，“汉丽宝叙事”的整体故事是把连贯在一起的几

则故事互为前因后果，由叙事带动认识，潜移默化着后来的阅读者，牵涉到马六甲王朝后裔对待中国/华人的观念态度。华人世界，实不应只是单方面阅读华文的文学再创作，断章取义理解，忽视关心隐藏在故事背后的马六甲王朝后裔心态。

当然，自二战后，结合着地方马来人与华人对“汉丽宝叙事”的各自表述，也结合着如此和亲、异族通婚、公主、国王等故事元素，单纯述说汉丽宝故事，很有旅游话题潜质；原来的“中国山”，即现今称为“三宝山”的山脚下，既然有“汉丽宝井”加上“汉丽宝路”，导游带着游客来来去去，也就愈发让原来不见得真有其事的“公主远嫁”变得活灵活现。但是，不能否认，中文世界的读者若不认识到《明实录》其中大量相关满刺加的记载，又不直接阅读《马来纪年》，他们对于“汉丽宝叙事”的内涵，肯定理解不够；就如过去至今许多以“汉丽宝和满速沙”为主题的中文创作，大抵都是再创作，而再创作者也可能只是从《马来纪年》全章挑出“公主远嫁”作题材，由此去演绎各自的观点，把自家观念放在自己版本“汉丽宝叙事”去讲述自己想要表达的想像。

如今走到“中国山”，马来文的山名依旧，但整座山上难以找到 biduanda China 的遗迹，也难以通过文献重构这个马来族群当中的华人血统后裔，更别说如何考据理解彼等昔日的生活状态。随着历史演变、人口迁移，当地华人现在称为“三宝山”的这座山，是当地华人公冢。三宝山上的老墓，上边多有使用从明朝万历到清朝宣统年号，埋葬了许多明清以来土生峇峇先辈，而碑文刻字也各自表达着当地文人的书法造诣，以传统石雕工艺传承。由此继续讨论，文人想像“汉丽宝”时代的华人历史景观，本不该仓促变成课文。

如果不以《明实录》和《明史》等材料对读《马来纪年》，或者确实难以厘清与谅解此地流传的“汉丽宝叙事”。可是，一旦“汉丽宝”纳入小学课文，形成一套既定的“汉丽宝故事”，以此“亲善”的概念去教化儿童，从学校教学灌输向每个家庭，其内容在一般群众心目中形成的汉丽宝故事印象，或就是许多人自小便被灌输的“汉丽宝”印象。其导致的结果，也可能会造成整整几代人片面的认识自己也片面认识他人。这样一些“汉丽宝”、“峇峇”、“中国山”等等概念化的词语组合，经历着一再被重组的过程，也就会演变成不同群体各取所需、各自表述的历史，让各种的观念一次次去主导说给自己也要说服外人听的故事，变成承载着处

理族群意识的观念。但这些观念不见得互相交流、理解、互鉴，基于的“史料”也不如想像般真是属于叙事所要诉说的年代与方向。

就真正阅读过《马来纪年》全文的群体而言，整体“汉丽宝叙事”对读者印象的影响却是由“亚历山大子孙”、“汉丽宝”、“伊斯兰”、“biduanda China”、“洗脚水”等等关键词联系而成。因此，《马来纪年》的“汉丽宝叙事”，固然不是历史，却是体现着马来社会传统以来海上交流的历史意识。而那些许多《马来纪年》改编的中文书写，作为前辈文字，在主观上可能寄托着宣传“族群亲善”的意愿，但是有所取舍的文字改编，反而不一定有利促成中文读者思考历史，也未必有助大众反思自古以来作为生存共同体的相互义务。同时间，各有扭曲的旅游话语，更可能影响各国民众旅游马六甲的文化交流。不完整叙事会导致不完理解，不见得有助促进国家或族群互相间真正朝向全面、坦诚与友好的交流。

责任编辑：陈妤佳

校 对：魏伽珈

# **“Hang Li Po Narrative”: The Recalls, Imagin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Ming Dynasty's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the Impression of “Malay Annals”**

**Extend study on the Re-imagination Versions of “Hang Li Po” Stories of the Last Century in Various Malaysian Chinese Written Materials and Textbooks**

**Ong Seng Huat**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Looking at the “Malay Annals” and the “Ming Dynasty Records”, the “Malay Annals” did not mention MingChenzu not Zheng He but the narrative of the annal is based on Princess Hang Li Po when describ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Malacca Sultanate and the Ming Dynasty. The annal narrates how the Chinese emperor recalled the common ancestry of both sides, admired the power of Malacca, actively sent envoys for diplomatic relations, and even sent a princess for marriage to the sultan.

Looking at the history of the “Malays Annals”, the narrative of the book occurred during the hundred years of resistance after the fall of Malacca’s capital, with legendary figures’ descendants still involved in politics. Therefore, it is worth considering that this historical legend reflects the vicissitudes of the Malay world’s resistance to Western aggression. The narrative based on Princess Hang Li Po contains many legends and metaphors, presenting an incomplete memory of maritime narratives that combines imagination, construction, mythology, and legends. It expresses the desire for equal prosperity between the “brotherly nations,” cherishing the continuous support of the Ming Dynasty while lamenting its inability to support the restoration of the country.

After the independence of Malaysia, the story of “Princess Hang Li Po” has been included in the Chinese primary schools textbooks for a long time, and also been repeatedly re-imagined and transformed its impression by

a lot of Chinese literati. Later, the tourism discourse has produced various contemporary versions of the story of “Princess Han Li Po”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e memory context of the “Malay Annals” .

**Keywords:** “Records of the Ming Dynasty”, Malacca, historical impressions, British colonists, Chinese primary school history textbooks

# 明清代的海上势力和东南亚、东亚的华侨

——以欧洲势力进入亚洲为背景

松尾恒一\*，梁青\*\*译

**摘要** 15 世纪，明代中国人从南海经过印度洋成功到达非洲大陆。此后不久的 16 世纪，明朝海盗和私人海商在东亚、东南亚、南亚诸国进行贸易，华人也随之进入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很多地方形成了华侨社会。这些地区也有来自南亚的穆斯林商人。几乎同一时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也进入亚洲，扩大了他们的殖民版图。其结果造成这些地区形成原住民、华侨和穆斯林等多人种、多宗教信仰的居民共存的情况。宗教上或是商业上的对立常常引起社会问题。本文将这种来自不同地区的人构成的地方社会中的宗教、社会、人种问题纳入视野，考察明代欧洲诸国进入亚洲时东南亚的华侨社会。

**关键词** 东南亚 华侨 海商 海盗 欧洲

## 一、明代欧洲海商进入亚洲以及海寇

日本向隋唐派遣留学生和留学僧，学习官僚组织形式和法律制度（律令），并以此为规范建立了与隋和朝鲜半岛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相似的国家机关。这种国家间的交流、往来和贸易主要由朝廷所把持。但实际上各国间也有私人性质的贸易，这些贸易活动被国家规定为非法活动并加以禁止。被禁止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们中的很多人都通过武力袭击别国船只，抢夺货物并掠夺或杀害船员。他们有时还远征邻国，掠夺沿海居民，作为海盗具有很强的反社会性。

---

\* 松尾恒一，博士，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 stage7358@hotmail.co.jp

\*\* 梁青，博士，湖北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Email: 3656493@qq.com

在东亚，自朝鲜半岛三国时代起，各国的私人海商就有对别国的官方船只和贸易船只进行非法行为的情况，他们是维护航海安全时无法忽视的一股势力。但另一方面，他们的活动不限于商贸活动，在官方的国际交流之外，他们也起到了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作用。

中国浙江附近的东海沿岸、广州附近的南海沿岸的私人海商，经过海路或者陆路进入泰国（暹罗）、菲律宾（吕宋）、印度尼西亚（咬留吧）等地，很早就在东亚、东南亚地区开展贸易活动，在此期间华人进入周边各国，形成了华人社会。明代，欧洲进入大航海时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人开始进入亚洲。他们和明朝的海盗以及私人海上势力勾结，有时和本国或别国的政府军以及其他私人海商交战。他们的目标是进入东亚、东南亚的商贸圈，进而达成对贸易的垄断。

### （一）明朝的海寇和欧洲海商的邂逅与勾结

在描述日本和明朝之间新的民间海商状况的资料中，郑舜功的《日本一鉴》是明朝方面最为有名的资料之一<sup>①</sup>。关于郑舜功，《明史》卷三百二十二，外国传三“日本国传”中有如下记载：

先是，蒋洲宣谕诸岛，至丰后被留，令僧人往山口等岛传谕禁戢。于是山口都督源义长具咨送还被掠人口，而咨乃用国王印。丰后太守源义镇遣僧德阳等具方物，奉表谢罪，请颁勘合修贡，送洲还。前杨宜所遣郑舜功出海哨探者，行至丰后岛，岛主亦遣僧清授附舟来谢罪，言前后侵犯，皆中国奸商潜引诸岛夷众，义镇等实不知。<sup>②</sup>

郑舜功被浙江都督杨宜派往日本镇压倭寇，于嘉靖三十四年（1556）从丰后国（现九州大分县）进入日本，结果被丰后国的领主大友义镇逮捕并软禁起来。次年，郑舜功的部下和大友氏的使者一同赴京都，请求室町幕府镇压倭寇，但郑舜功一直留在丰后。在丰后期间，郑舜功被允许调查日本的国情，一直到嘉靖三十六年（1558）随大友氏的使僧清授一同被送往宁波。

<sup>①</sup> 《日本一鉴》的内容、资料的价值，可参阅渡边三男《明末の日本紹介书〈日本一鉴〉について（关于明末介绍日本的书《日本一鉴》）》，《驹泽大学研究纪要》卷十三，1955年3月。

<sup>②</sup>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第8355页。

嘉靖年间，中国大陆沿岸出现了倭寇，他们主要从事海盗和走私活动。这些人虽然被称为“倭寇”，意指日本海盗，但实际上明国人的数量占了一半以上<sup>①</sup>。郑舜功为了应对“嘉靖的大倭寇”才到访日本，对日本国情详细调查后写下《日本一鉴》。

《日本一鉴》记载了日本和明朝之间的走私贸易源自倭寇，同时也谈到了以日本为据点进行活动的王直。

夫广私商始自揭扬县民郭朝卿。初以航海遭风漂至其国，归来亦复往市矣。浙海私商，始自福建邓獠，初以罪囚按察司狱。嘉靖丙戌五年（1526），越狱遁下海，诱引番夷私市浙海双屿港，投托合澳之人卢黄四等，私通交易。嘉靖庚子十九年（1540）继之，许一松、许二楠、许三栋、许四梓勾引佻（佛）郎机国夷人，络绎浙海，亦市双屿、大茅等港，自兹东南衅门开矣。嘉靖壬寅二十一年，宁波知府曹诰，以通番船招致海寇，故每广捕接济通番之人，鄞乡士夫尝为之拯拔。知府曹诰曰：“今日也说通番、明日也说通番、通得血流满地方止。”明年癸卯二十二年，邓獠等寇闽海地方，浙海寇盗亦发，海道副使张一厚因许一、许二通番致寇延害地方，统兵捕之。许一、许二等敌杀得志，乃与佻（佛）郎机夷竟泊双屿。伙伴王直于乙巳岁二十四年往市日本，始诱博多津、倭助才门等三人，来市双屿。明年复行风布其地，直浙倭患始生矣。<sup>②</sup>

这份资料对欧洲最早造访中国大陆的葡萄牙人进行了记录，描述了他们和明朝海盗勾结，从大陆南部进入内陆地区的情况。这些东亚的海盗和欧洲那些拥有武装的海商结合，扩大了活动范围，对明朝

<sup>①</sup> 从日本方面的资料来看，有濑户内海的能岛、来岛、因岛的氏族率领海盗进攻明国沿海地区的记载（香西成资记《南海通记》卷八“豫州能屿氏、大明国侵略记”），但很难断言是否正确记载了史实。另外，该资料中还有倭寇的船上挂有象征武神八幡神的八幡旗的记载。“八幡”的中文读音“bahan”被当作海盗行为的代名词，日本 16 至 17 世纪时曾经广泛使用过。据说当时日本的倭寇在船上挂着八幡旗前往中国大陆沿岸，从那里带回了“八幡”的中文读法，从而在日本传播开来。显然日本方面已经意识到这一点，西川如见所著《长崎夜话草》（1720 年）“唐船始入津之事”中，曾经对这种把日本皇室的军事神和海盗行为相关联的情况表示不满。

<sup>②</sup> 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取自《海上史资料室》：<https://www2s.biglobe.ne.jp/tetuya/REKISI/kaizoku/ikkan3gen.html>

乃至周边地区的商业活动和国家政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该资料对这段历史的记载是非常重要的。

《日本一鉴》中，记载有明代广东地区最早进行走私贸易的郭朝卿的事迹。郭朝卿最初在航海中遭遇风暴，漂流到外地，以此为契机进行贸易。另外，浙江海域的民间贸易（走私贸易）是从福建的邓獠开始的。邓獠最初因罪被按察司关入大牢，嘉靖五年（1526）越狱逃往海上，和“番夷”也就是从事海盗活动的葡萄牙人在浙江海域的双屿港进行走私贸易。合澳的卢黄四等人也和他勾结，进行走私贸易。嘉靖庚子十九年（1540），许一松、许二楠、许三栋、许四梓四兄弟也把葡萄牙人带到浙江海域，在双屿港等地进行贸易。

双屿逐渐成为明朝海商和葡萄牙人、东南亚人、日本人进行贸易的国际港口，慢慢繁荣起来。在进入双屿之前，葡萄牙人主要以广州为据点在南海进行活动，他们在双屿进行活动说明其活动范围已经扩大到东海甚至内陆地区。葡萄牙人在双屿建了政府、医院、教会等设施，试图将其殖民地化。对这一事态感到不安的明朝政府，于1548年派浙江巡抚朱纨进攻双屿<sup>①</sup>。当时许三栋的部下王直从战火中逃离，组织了海盗集团，以浙江省舟山群岛的烈港为据点自称徽王，成为和徐海齐名的倭寇头目。

## （二）进入菲律宾的海盗林凤

与东南亚相关的比较重要的人物有1571年袭击菲律宾的海寇林凤。当时的菲律宾在首府为墨西哥城的新西班牙（Nueva España）的管辖下，西班牙人从那里出发访问明朝，想要和中国人进行贸易。在西班牙人前往中国的途中和滞留期间，他们收到林凤袭击菲律宾的报告。可见海寇无论是对明朝的国家运转还是对国际贸易都带来很大的损害。

两国之间的交涉，可以参考西班牙天主教传教士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所写的《中华大帝国史》（*Historia de las cosas má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

<sup>①</sup> 参见“アジア城市案内”制作委员会著《浙江省009 普陀山~“海天佛国”和舟山群岛》，まちごとパブリッシング，2016年8月。资料取自：Google Books“アジア城市案内” [https://books.google.co.jp/books?redir\\_esc=y&hl=ja&id=r2E0DQAAQBAJ&q=1548#v=onepage&q=1548&f=false](https://books.google.co.jp/books?redir_esc=y&hl=ja&id=r2E0DQAAQBAJ&q=1548#v=onepage&q=1548&f=false)，2016年

reino de China) ①。该书对西班牙人一行所看到的中国商船、渔船以及明朝地方政府款待他们的餐饮和艺能都进行了记录。因其还记录了当时中国从庶民到统治者等不同阶层的人的生活，作为民俗志的价值也很高。

当时与东南亚有关的海盗还有马来半岛北大年王国的林道乾，以及曾经主导菲律宾的华侨社会，后因西班牙人的追捕而逃往日本的李旦。以下将分章节在华侨社会的背景下探讨林道乾和李旦。

### （三）徐海和翠翘的爱情故事

明代的海盗系谱中，在勾结葡萄牙海商，被朱纨打败的海寇许氏兄弟之后，还有一些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都受到关注的海盗，他们的故事颇具传奇性，甚至被写入文学作品。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是徐海。

明末清初的文人青心才人创作的小说《金云翘传》以翠翘这位女性为主角，讲述了为生活所迫沦为娼妓的翠翘和徐海之间的爱情悲剧故事。这个故事在 19 世纪前期被越南的阮朝文人阮攸改编成长篇叙事诗《金云翘》，在越南成为了国民文学的经典作品。青心才人的原作还被翻译为满语和朝鲜语，在日本也由曲亭马琴改编成通俗小说《风俗金鱼传》（1839），可以说是风靡亚洲的古典作品。明朝的海盗一方面进行着反社会的活动，另一方面也在亚洲地区广受注目，成为文化创作的一大题材。

## 二、进入马来半岛的海寇

### ——泰国南部的穆斯林和华侨社会

接下来着眼于明代进入马来半岛的海寇，考察泰国南部的穆斯林和华侨社会。嘉靖三十八年（1560）王直死后，林道乾继承了其麾下的海盗，成为当时活动在广东、福建地区最大的海盗集团。他的海盗活动也引起了当时进入东南亚、东亚的欧洲人的关注，西班牙传教士弗莱·胡安·德拉·康塞普西（Padre Fr. Juan de la

① ゴンサーレス・デ・メンドーサ著，長南実訳，矢沢利彦訳《シナ大王国誌》，《大航海时代丛书》第1期6，岩波书店，1965年。

Concepcion) 编写的《菲律宾诸岛通志》第三编第九章第九节中, 记录了林道乾对台湾原住民的残暴行为<sup>①</sup>。林道乾进攻澎湖列岛和台湾地区, 后来被广东总兵俞大猷以及戚继光率领的明朝水军打败, 经过南海逃往马来半岛, 最终来到北大年王国。

### (一) 女王统治下的北大年王国

当时的北大年由公主 Raja Hijau、Biru、Ungu 和 Ungu 的女儿 Kuning 统治, 与北方接壤的大城王国处于敌对关系。从台湾经过南海逃到马来半岛的林道乾, 在北大年王国受到欢迎, 他为北大年王国制造了火炮, 并用这种最新兵器帮助北大年王国战胜了大城王国。对北大年王国有很大贡献的林道乾, 后来成为北大年的高官, 改信伊斯兰教, 建成库塞清真寺。

欧洲人进入北大年王国最早是在 1516 年, 这些葡萄牙人还从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 来到中国的澳门。在 16 世纪到 17 世纪, 葡萄牙、荷兰、英国人相继在北大年建立商馆, 来自日本和琉球的贸易船只“朱印船”也来到这里。



图 1: 北大年王国的四位公主 Raja Hijau、Biru、Ungu、Kuning

(互联网存档: [http://www.geocities.ws/prawat\\_patani/queenspatani.htm](http://www.geocities.ws/prawat_patani/queenspatani.htm))

设在北大年王国的荷兰商馆和英国商馆, 在欧洲和中国的贸易中作为中转站, 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sup>①</sup> 村上直次郎译, 东洋文库《バタヴィア城日誌》3, 平凡社, 1987 年, 付録二, コンセプション編“フィリピン諸島通志”, 1788 年。

1909 年随着《英暹曼谷条约》的签订，北大年王国被编入泰国，成为北大年府。大炮的图案成为北大年府的府徽，可见北大年王国时期的历史，特别是林道乾的事迹至今仍然是北大年人身份认同的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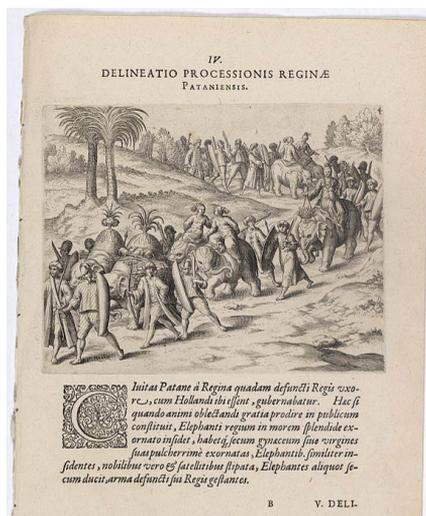


图 2：1609 年荷兰人所绘的北大年女王巡游的情况



图 3：刻在桥上的北大年府的府徽，描绘的是林道乾制造的大炮  
(松尾摄于 2019 年 2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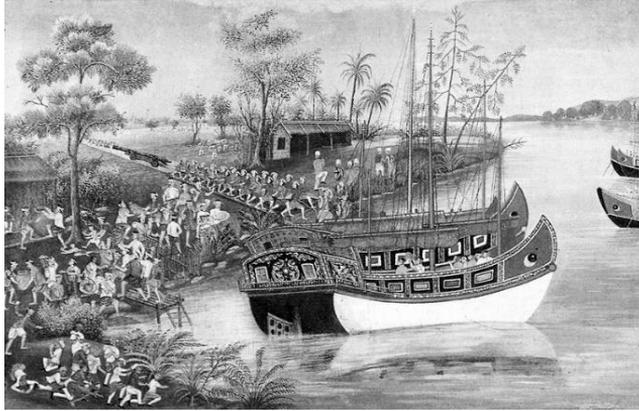


图 4: จังหวัดปัตตานี (北大年府)

(互联网存档: [https://po13man.blogspot.com/2014/03/blog-post\\_6336.html](https://po13man.blogspot.com/2014/03/blog-post_6336.html))

图 4 是林道乾来到北大年王国后大约两个世纪，暹罗国王拉玛五世（1853-1910）时期北大年王国港湾的样貌。船体前部绘有大眼睛是中国船和暹罗船的共同特征，因此无法判别究竟是哪国船只。但林道乾进入北大年的时候，北大年已经和明朝、大城王国有广泛的贸易，当时的北大年王国里已经形成华侨社会的可能性很高。值得一提的是，在灵慈圣宫旁边的历史资料馆里，有建在港湾和海滨街道上的客家传统的圆形“客家土楼”、“福建土楼”建筑的模型，这显然是经过严密的历史考证后制作的（见图5）。现在北大年府的华侨中，客家人占了很大的比重，这应当是一直以来前往马来半岛的华人中客家人较多，这种情况延续到了现代的华侨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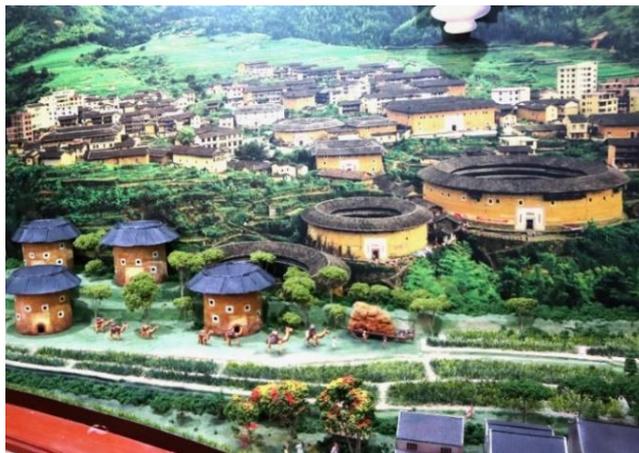


图 5: 16-17 世纪，沿河建造的客家建筑“客家土楼”、“福建土楼”

## （二）女神林姑娘和北大年王国的华人社会

在考察北大年华侨社会的历史时，灵慈圣宫中祭祀的女神林姑娘是非常重要的内容。林道乾的妹妹“林金莲”死后，被当作女神来祭祀，称为“林姑娘”。因为母亲十分希望林道乾回家，金莲受命从明国来到北大年。但林道乾已经成为北大年的高官，执意要留在这里。最终母亲的意愿未能实现，金莲在这里上吊自尽。金莲临死时曾经诅咒兄长所建的清真寺永远无法完成。

传林姑娘历尽千辛万苦至洛坤登岸，从来往的商贾中得知兄长的下落，欣喜之中扬帆直驶北大年。不料途中随行人员有9人病故，遂葬于海岸边，并植9棵松树作纪念。此即今天“九松”地名字的由来。林姑娘终于寻到兄长，讲明来意，规劝其早日回乡与母亲团聚。但道乾其时已官运亨通、享尽荣华、且又正在监建一规模宏大的清真寺，于是拒绝了其妹的祈求。苦劝无效绝望之下，林姑娘决心以死相谏。第二天，她在离施工中的清真寺最近的一棵猴枣树上自首缢身亡，据传死前曾诅咒该寺永远无法建成。道乾获悉深受震动、极为悲伤、无心施工、无颜返乡。据说该教堂快要竣工时3次为雷电所击毁；后人每要复工，均有意外发生、遂放弃此项工程。至今这座未完成的清真寺仍立于离北大年7公里的迦斯村中，与林姑娘墓仅一箭之隔。<sup>①</sup>

其后，因为雷击等原因，屋顶受损，即便现在的清真寺也没有房檐。库塞清真寺的近况如图6所示。

<sup>①</sup> 广东省澄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澄海文史资料》第20辑，2001年，第121-123页。关于林姑娘的传说，旅泰华人作家蔡加茂的《林姑娘庙游记》也有记载。本资料信息由王玉冰（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师）提供。



图6：林道乾建立的库塞清真寺

(松尾摄于2019年2月)

### (三) 作为清水祖师庙的灵慈圣宫

林金莲死后，被祭祀在以清水祖师为主神的灵慈圣宫中，参加祭祀的主体是当地的华侨。图7显示的是灵慈圣宫中最大的活动，旧历正月十五的“常年游神盛会”。每当这时，库塞清真寺旁边的林姑娘墓前都会装饰有美丽的裙子，以及献给林姑娘的其他各种贡品。



图7：在金莲自缢身死的树上挂着裙子，祭坛上供奉着鞋子

灵慈圣宫创建于万历二年（1574）<sup>①</sup>。这是在泰国最早祭祀福建出身的清水祖师的庙宇，当时的华侨社会很可能是在这里形成。图8和图9显示的是清水祖师为主神，并且祭祀着林姑娘的灵慈圣宫和林姑娘像。



图8：祭祀着清水祖师、林姑娘的灵慈圣宫

（松尾摄于：2019年2月）



图9：林姑娘像

（松尾摄于：2019年2月）

<sup>①</sup> 参见李天锡《闽南民间信仰在华侨华人中的传播及其作用》，资料取自：南陈宗亲网 <http://www.nanchens.com/gdjj/gdjj01/gdjj01016.htm>



图 10: 灵慈圣宫平面图

在马来西亚，槟榔屿的祭祀清水祖师的蛇庙特别有名。出身福建的清水祖师，在旱灾来临时降下慈雨的传说广为人知，因而与水的信仰紧密结合在一起。灵慈圣宫内有涌出圣水的“天井”，位于庙的后方西侧（见图 10）。从这个井里汲出的水会在“常年游神盛会”上得到加持，而后灌入瓮中，贴上“清水祖师”、“林姑娘”、“妈祖”的封签。在仪式时，他们准备大量水瓶，将这些圣水发放给参拜者。在“常年游神盛会”上，北大年客家会馆、中华学校、北大年同德善堂等单位，以及北大年府的华侨互助组织，都会派人参加这场华丽的游行。

信仰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宋大峰祖师乘坐汽车在街道巡游，推测是由祭祀大峰祖师的互助集团所组织的。大峰祖师是北宋的僧侣，可以看到他在泰国等东南亚地区华侨社会中被祭祀的例子。大峰祖师和清水祖师都是华侨的精神纽带，在华侨之间的相互扶助中，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另外，北大年客家会馆的游行中也可以看到，以往的“客家土楼”、“福建土楼”等具有特色的建筑物也有很多，这可以说是客家人聚居的华侨地区的特色景观。

#### （四）北大年华侨和“常年游神盛会”

“常年游神盛会”时，“清水祖师”、“林姑娘”、“妈祖”等诸神从灵慈圣宫出发，乘着神轿在街上巡游。其中还有“林姑娘”的神轿被抬轿的人们带到北大年河中游泳的仪礼，据说是还原林金莲渡南海的场景，在观众们的欢呼声中，祭礼达到高潮。女神林姑娘的原型林金莲的事迹有很多带有传说性质，但她的兄长明代海盗林道乾经过南海进入北大年王国是史实。林道乾的到来，给当

时占大多数人口的马来半岛穆斯林，以及信仰清水祖师、高峰祖师的福建客家移民都带来了很大影响。



图 11：横渡北大年河的林姑娘像

（松尾摄于：2019 年 2 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北大年的华侨在生活上受到很多制约，而马来人面临的状况可能更困难。在佛教国家泰国，马来穆斯林们曾经为北大年王国的复国，进行恐怖袭击等案件。这一动向在进入 21 世纪后变得更活跃，其中著名的事件是 2004 年以马来穆斯林为中心的反政府运动，同一时间发生多起恐怖袭击，库塞清真寺也是据点之一。恐怖袭击的主要原因是泰国的他信政权以维护治安为名义，派出警察甚至军队进行深度干预，其行为引发马来居民的强烈反抗。泰国政府对恐怖活动进行严厉镇压，甚至出现人员伤亡。在泰国政府的打压下，穆斯林居民也有不少逃往邻国马来西亚<sup>①</sup>。

<sup>①</sup>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泰国南部的马来穆斯林的反政府活动和独立运动，请参考松尾恒一著；梁青译《明清时期中国东海、南海的海盗活动和记忆——兼与日本、中国、东南亚的宗教史迹印证》，澳门大学《南国学术》2018 年第 4 期；松尾恒一，明代南シナ海の海盜の活动と记忆——日本・中国大陆・东南アジアの宗教史迹をめぐって，荒见泰史编『仏（佛）教の东渐と西渐』、アジア游学 251 号、勉诚出版、2020 年 8 月。



图 12：北大年河畔的巨树下设置的祭祀清水祖师和林姑娘祭坛  
(松尾摄于：2019 年 2 月)

现在马来半岛复杂的宗教状况和人种问题，除了和近世欧洲诸国的到来有关，也和来自明代中国的海寇和华侨的动向有一定的渊源。要理解当下东南亚各地区共同体的存在方式和生活、信仰，也需要把欧洲人的到来和周边亚洲国家间的交流纳入观察的视野。



图 13：在马来西亚靠近泰国边境的库林，从泰国南部移居过来，经营马来餐厅的穆斯林夫妇和王琛发教授合影  
(松尾摄于 2018 年 9 月)

### 三、17世纪：李旦（Andrea Dittis）和马尼拉的华侨社会

接下来我们考察在西班牙占领时期的马尼拉，曾经成为华侨社会的头目的海寇李旦（Andrea Dittis）和马尼拉华侨社会的特质。在马尼拉，李旦作为华侨社会头目，坐拥巨额财产，因而被西班牙人追捕。他经菲律宾逃往南海，又经由东海来到日本九州，停留在王直的据点平户，和王直同样受到松浦氏的庇护。李旦不仅推动和明朝的贸易，也推进了和东南亚的贸易。我们通过日本的国际港口平户的英国商馆馆长 Richard Cocks 的记录可以了解到上述情况。

Andrea Dittis was governor of the Chinas at Manila in the Philippine and in the end the Spaniards picked a quarrel on purpose to seize all he had, to the value of above 40,000 taels and put him into the galleys, from whence he escaped some 9 years since and came to Firando（平户），where he hath lived ever since.

参考译文：Andrea Dittis 乃菲律宾马尼拉之中国人的首领。而西班牙人为了取得其所具有之价值四百贯以上的货品而展开了争斗，将他拘留于 galeyen 船内。九年后，他逃离该船，来到平户，以后一直居住于该地。<sup>①</sup>

李旦和欧洲的关系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和英国的亲密交往，他甚至把在平户的自家宅邸提供给英国商馆使用。可能因为这层关系，英国商馆长的记录中频频提到李旦，讲到他逃往日本以前的事迹，包括在马尼拉成为华侨头目，坐拥巨额财富等事情。

#### （一）通过海盗代办明朝皇帝的贸易许可证

欧洲人进入亚洲，以日本为据点和明朝进行贸易时，需要明朝皇帝的许可。在这件事情上李旦发挥重要作用。据推测，需要明朝皇帝的许可是因为葡萄牙海商以澳门为据点，要经过南海和东海去

---

<sup>①</sup> *Diary Kept by the Head of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Diary of Richard Cocks*, Richard Cocks 的日记有不同版本，本文使用的版本为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英国商馆长日记·原文编》全三册，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1978年。英文标题为 *Diary Kept by the Head of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Diary of Richard Cocks*。

往九州的平户地区，必须要有明朝皇帝的通航许可才能经过这片海域。推测的依据主要是以下史料：

And truly to my hartes greefe I am eavery day more then other out of hope of any good to be donne in Japon, except trade may be procured into China, w'ch I am not yet out of hope of. Although Capt. Whaw (李华宇=李旦之弟) of Nangasaque (长崎) be dead, whoe was a cheefe dealer hearin, yet his brother, Capt. Andrea Dittis (李旦) of Firando, telles me it is concluded vpon, & that he expectes a kinsman of his to com out of China w'th the Emperours passe, promesing to goe hym selfe w'th me in person, when we haue any shipping com to goe in; for in Japon shipping we cañot goe for China. This Andrea Dittis is now chosen capten & cheefe c'ander of all the Chinas in Japon, both at Nangasaque, Firando (平户), & else wheare, & I trust in God will proue the author in soe happie a matter as to gett trade into China.

《英国商馆长日记》中有一封他从长崎寄给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信：“RICHARD COCKS TO THE EAST INDIA COMPANY NANGASQUE, MARCH 10, 1619/20, WITH AN ENCLOSURE Nangasaque (长崎) in Japan, the 10th of Marche.”<sup>①</sup>

欧洲海商需要向明朝皇帝申请和日本进行贸易的许可，而欧洲方面的申请以及皇帝颁发的许可证“Emperours Passe”都由住在日本的李旦代理。日本方面除了隋唐时期的博多外，还有北九州的平户和长崎是国际贸易港口，国际贸易都置于江户幕府的管理下。中日两国以及欧洲人在中日之间的贸易，甚至和东南亚的贸易都处于明朝政府和江户幕府的官方管理下。虽然两国都有相当数量的海军力量，但实际上特别是中国方面的国际贸易实权，都掌握在具有强大实力的海盗手中。

这一时期的海寇除了夺取其他船只货物，袭击沿岸居民等反社会活动，诸如李旦这样具有强大实力的海寇还在国家默许下掌握国

---

<sup>①</sup> 基于东京大学史料编纂编《日本关系海外史料〈イギリス商館長日記原文編之下〉》，东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286页。

际贸易许可权。自古以来在国家管理下的国际贸易中，海盗所进行的私人商业活动的比重逐渐高起来。

## （二）因欧洲人的到来而形成的多民族国家

### ——多个民族该如何共存

菲律宾有很多使用塔加洛语的原住民居住的岛屿，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从大陆来的明朝人也有部分移居到这里，具有一定的势力。后来西班牙人来到这里，将其置于新西班牙（墨西哥）的管辖下。到 20 世纪，历史学者 Charles Ralph Boxer 编纂的写本 *Boxer Codex*<sup>①</sup> 中，记载有推测是记录于 1590 年代初的塔加洛族为首的原住民，以及明朝贵族、平民、日本人的图景，可以窥见在西班牙统治下不同国籍的人们构成的社会的样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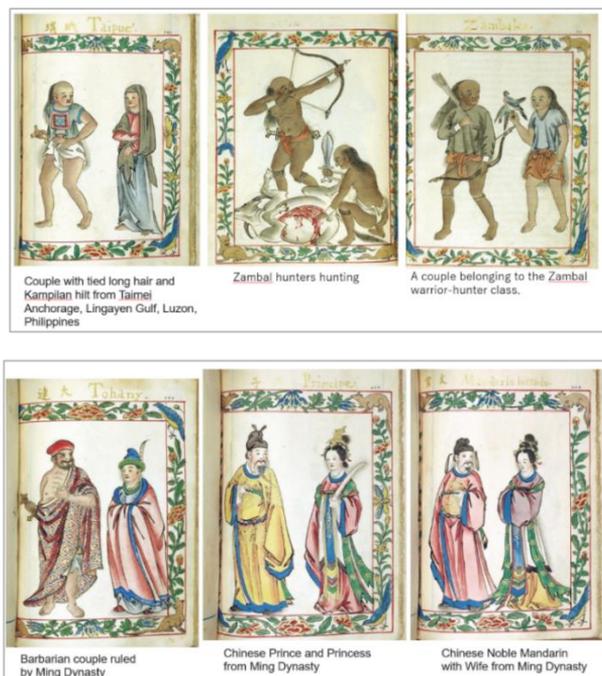


图 14: Natives and Foreigners in the Philippines (部分), *Boxer Codex*

(互联网存档: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oxer\\_Codex](https://en.wikipedia.org/wiki/Boxer_Codex))

<sup>①</sup> Charles Ralph Boxer, *Boxer Codex*, late 16th century, Lilly Library, Indiana University Librarie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oxer\\_Codex](https://en.wikipedia.org/wiki/Boxer_Codex).



**图 15: Japanese Couple (Possibly Samurai/Ronin) living in Manila, Philippines, wearing yukata with hair styled in Chinese fashion, from Japan during Nanban trade era**

(互联网存档: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oxer\\_Codex](https://en.wikipedia.org/wiki/Boxer_Codex))

正如 Barbarian couple ruled by Ming Dynasty 那幅图，原住民在文化上受到明朝习俗的影响。原住民的婚礼，特别是女性的装束都有很强的明朝婚礼色彩。图片还描述了丈夫是带刀武士的日本女性，对于这位女性的描述是“wearing yukata with hair styled in Chinese fashion”，可以了解到她穿着日本的服装，但发型是模仿明朝女性。文中的“Nanban”是日语中的“南蛮”，具体指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荷兰人被称为红毛人，与南蛮相区别）。也就是说，这里的 Nanban trade 是指的日本与马尼拉的贸易。这位武士不知是因何种理由失去主君，或者是被主君赶走成为浪人，乘坐西班牙船或者得到日本幕府贸易许可的朱印船，来到菲律宾寻找新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越南的会安形成了日本人街。大城王国也有日本人街，有一位日本武将山田长政为人们所知，他为暹罗而与西班牙舰队作战，并在获胜后成为暹罗高官。虽然与华侨社会相比，规模要小一些，但日本人和中国人几乎在同一时代开始进入东南亚社会。

### (三) 福建—马尼拉—墨西哥贸易与菲律宾的天主教传教

塔加洛语族的原住民所居住的菲律宾群岛被西班牙人统治以后，大约 17 世纪初时日本人也来到这里，不过和西班牙人贸易最多的还是出身福建的华侨。福建和马尼拉之间的贸易，在菲律宾形成

以马尼拉为中心，以福建人为主体的华侨社会，人数大约有两万。马尼拉由此形成当时东南亚地区最大的华侨居住地。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日本和清朝进行贸易的港口长崎也有清朝海商的居留地“唐馆”，能容纳大约 2000 人居住。马尼拉的华侨社会的规模是唐馆的十倍。

福建人出口的生丝、绢织物、陶瓷器等，经由马尼拉出口到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给新西班牙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与之相对，新西班牙则向明朝输入大量产自波托西银山的银。华侨们在居住地开展农业、渔业活动，从事手工业的人也逐渐增多，这样一来在当地保持华人的生活习惯也变得容易，逐渐开始定居在这里。

对于西班牙人而言，给他们带来巨大利益的马尼拉的福建华侨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与此同时，华侨势力的增长，对于西班牙人又是巨大威胁。为了防备华侨，他们在马尼拉的帕西古河口南岸设置华侨隔离区域帕里安（parian），在那里进行商贸活动。另外，在信仰方面，在西班牙统治区域内的居民都要改信天主教，在精神、信仰层面推进西班牙人的同化政策，巩固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为了统治塔加洛语族的原住民以及占据相当人口比重的明朝移民，西班牙人制定了规定居住地等社会政策。这在欧洲人进入亚洲之前是从未有过的，可以说在新的世界形势的变动中，一些人的命运变得不幸。

西班牙的天主教各派别，被称为托钵修道会（Mendicant orders）。与葡萄牙海商一同到来的耶稣会在传教时很重视政府人员，而托钵修道会重视清贫，传教时重视庶民。道明会和圣方济各会都属于西班牙的托钵修道会，圣洛伦索（Lorenzo Ruiz 1594-1637）也是多米尼克会的成员。他是马尼拉的岷伦洛出生的混血儿，父亲是从明朝移居过来的中国人，信天主教，母亲是塔加洛原住民。他从父亲那里学习中文，从母亲那里学会塔加洛语。1636 年，在岷伦洛教会工作的洛伦索被人冤枉杀害西班牙人，同年乘坐西班牙传教士的船逃往琉球。然而在琉球遭到逮捕，次年被送往禁教的日本长崎，在长崎差役的严刑拷问下殉教。值得一提的是，到 1987 年，在梵蒂冈罗马教皇将“日本的十六殉教者”列为圣人，他位列其中，成为菲律宾的第一个圣人。

从欧洲来到亚洲的传教士，在亚洲传播一个新的宗教并在这里进行殖民统治。通过这种新的社会形态的构筑，通过传教和吸纳信徒，造成了以往从未有过的国际社会状况，也造成了不少人的苦难。对于这段历史造就的新的社会和个人的存在方式，以及多种文化的共存方

式进行思考，在当今世界很多地方由于各种历史原因造成的多民族共同生活的状况下，是有很大大意义的。

全球化以近代之前完全无法想象的规模和速度，不可逆地席卷了各地区。欧洲人来到原住民和华侨混住的亚洲地区，究竟产生怎样的社会变化，或者说这种变化如何持续，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不仅是亚洲各国要做的事，对于欧美人文科学研究者而言也有必要从国际的、学际的视角进行研究。

## 后记

本文是基于 2022 年 12 月在闽南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院所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东南亚区域国别与华人华侨”上，所发表论文《明清时期海上势力与东南亚、东亚的华侨：以欧洲向亚洲发展为视角》而撰写。在该学术研讨会上，得到闽南师范大学等学校的许多学者指导，再次一并表示衷心感谢。此外，关于本文中泰国北大年地区林道乾、林姑娘相关的史迹和民俗调查，得到王琛发教授的大力帮助，在此对王琛发教授表示感谢。本文为日本科学研究助成项目“日本仏教と東南アジア仏教との比較研究-政治と権力の視点を中心として”（19K00097、2019 年度-2023 年度）的成果，谨此向日本学术振兴会的支持表示感激。

责任编辑：王康玮

校    对：林美静

# **European expansion into Asia and Establishment of Chinatowns in Southeast Asia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the 15th and 16th centuries**

**Matsuo Koichi & Liang Qing**

National Museum of Japanese History & Hubei University

**Abstract:** China succeeded in reaching Africa via the Arabian Sea from the East China Sea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in the 15th century. Chinese merchants and pirates then traded with East, Southeast and South Asia. The Portuguese often traded with China in those days as well. Many large numbers of Chinese moved into these foreign areas and established Chinatown.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the Chinatown came to be called *Hua Ch'iao*. Muslims from South Asia moved to these communities as well. At the same time, Europeans from Portugal, Spain and the Netherlands voyaged to Asia. They either took control of some areas, or they built a trading post in each country.

As a result, the areas came to consist of native inhabitants, Chinese, Muslims and Europeans. They had different customs, lifestyles and religion. Europeans also tried to spread Christianity to control their spirituality. The new situation caused a great deal of social issues, many of which have been resolved over five centuries. However, new difficulties arose from the rapid spread of globalisation after World War II.

**Keywords:** Southeast Asia, native inhabitants, Chinatown residents, *Hua Ch'iao*, sea merchants, pirates, European merchants, various religions

# 16-17 世纪西方游记中的闽南与世界

欧俊勇\*

**摘要** 16-17 世纪是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重要时期。闽南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航运贸易传统，使其成为西方了解中国的前沿地带。传教士在此游历和传教过程中撰写了大量有关闽南的游记作品，并传播到欧洲，这使得闽南地区在“西学东渐”和“中学西渐”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这些文献直观描述了闽南日常生活镜像、商业贸易拓展和东西方文化的等内容。重估 16-17 世纪西方传教士留存有关闽南书写，对于理解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16-17 世纪 西方游记 闽南 学术价值

## 前言

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欧各国和天主教会不断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和使节团，开启了第一次中西文化交流高潮。16-17 世纪是西方旧耶稣会士在中国活动的重要时期，遗存的文献非常丰富。冯承钧认为传教士们“于传布宗教之外，兼沟通中西学识，撰译无虑数百种，会士事迹可考者近五百人，其留存之史料，关系应甚重要也”<sup>①</sup>。闽南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传统航运贸易，使其成为西方了解中国的前沿地带。传教士在游历和传教过程中，撰写了大量的文献，并传播到西方世界。因此，闽南地区在“西学东渐”和“中学西渐”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对于 16-17 世纪西文闽南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外贸易史和宗教文化史方面。小叶田淳、张增信、金国平、翁佳音、廖大珂、杨国桢、谢必震、徐晓望等人的研究成果利用西文闽南文献来勾勒

---

\* 欧俊勇，博士，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Email: 67712342@qq.com

① 冯承钧《入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序言，费赖之（Aloys Pfister）著；冯承钧译《入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商务印书馆，1938 年，第 1 页。

闽南地区在世界贸易网络中的历史意义<sup>①</sup>，以此揭示闽南商人群体在东南亚贸易市场的“垄断地位”<sup>②</sup>。由此引申的Chinecho所指地域的讨论一度也成为研究的热点，C.R.克舍综合讨论了西方文献的记载认为“Chinecho本身则被用来不加区别地指漳州和泉州”<sup>③</sup>，杨国桢则直接指出Chinecho为漳州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月港<sup>④</sup>。张先清的关注点在于郑芝龙家族与传教士的关系，他认为17世纪方济各会会士利安当、文度辣的书简揭示了郑芝龙家族非常重视对马尼拉的贸易<sup>⑤</sup>。吴巍巍、林金水等人的研究围绕多明我会、耶稣会等教会教士在华传教历程进行讨论，以此来揭示闽南地区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同时围绕“礼仪之争”讨论了西方宗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sup>⑥</sup>。尽管前期相关研究成果都意识到西方文献对于研究闽南社会的历史价值<sup>⑦</sup>，并将其与传统文献进行互证讨论。但是目前学界关于闽南地区与海外关系的研究成果更多引用了18世纪以后的传教士文献，这大概与18世纪后欧洲教会掀起了耶稣会士文献出版热潮有关，系统的文献整理更便于学术研究。近些年来，关于西方中国文献的翻译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一大批西方传教士文献陆续译介为中文，并引起了学界新的关注。回顾这一时期传教士留存有关闽南文献，对于了解中国东南沿海社会生活和东西方文化交流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①【日】小叶田淳《中世南岛交通贸易史的研究》，刀江书院，1941年；金国平《中葡关系史地考证》，澳门基金会，2000年；金国平《十六世纪海图与文献中的“Os .Lequios”、“O Lequio Pequeno”及“A Ilha Formosa”》，2012年，台湾师范大学演讲稿；翁佳音《十七世纪福佬海商》，“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7辑上册，1999年；翁佳音《荷兰时代——台湾史的连续性问题》第七章，稻乡出版社，2008年，第153页；廖大珂《早期葡萄牙人在福建的通商与冲突》，《东南学术》2000年第4期；杨国桢《葡萄牙人ChinCheo贸易居留地探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徐晓望《论明末清初漳州区域市场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4期。

②徐晓望《闽商发展史·总论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5页。

③【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中华书局，1990年，第223-234页。

④杨国桢《闽在海中——追寻福建海洋发展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第162页。

⑤张先清、王荟《西班牙天主教文献中的郑成功家族故事》，《学术月刊》2015年第4期，第127页，154-159页。

⑥吴巍巍《闽台基督宗教关系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年；吴巍巍《西方传教士与晚清福建社会文化》，海洋出版社，2011年；林金水《福建与中西文化交流史论》，海洋出版社，2015年；代国庆《明清时期福建天主教汉文文献概述：西教士部分》，陶飞亚、杨卫华编《汉语文献与中国基督教研究（上册）》，上海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37-148页。

⑦郑学檬《点涛斋史论集——以唐五代经济史为中心》，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20-428页。

## 一、闽南日常生活的镜像

闽南地区是传教士们最早接触和了解中国的区域之一。西方传教士们在闽南地区的游历过程，往往将他们的所见所闻记录其中。闽南人的生活环境、生活习惯、民风民俗等镜像都引起了他们浓厚的兴趣。在他们眼中，闽南地区是一个富庶的区域，城市规模极大，百姓安居乐业。

### （一）城市生活

在传教士眼中，闽南的城市建筑规模宏大，城市商业繁荣。加里奥特·佩雷拉在《关于中国的一些情况》如此描写泉州城：

泉州市和我们所看到的其他很多城市都建有很好的街道，又宽又直。看到它们如此之直，没有任何东西凸出来，真是令人赞叹。房屋的基础部分是石砌的，但是其余部分都用木材建成。在马路的两旁有一些檐廊，由商人占用。除去这部分面积外，剩下的部分可以让十五个人骑马并行。这些城市还建有很多拱形凯旋门，横贯马路两旁，所以人马只得从拱形门下穿行。拱形门的门楼建在高高的柱子上，上面是木建筑，华美异常，用瓷瓦铺顶。门楼下面被用来出售小装饰品，行人也在那里躲雨避阳。达官贵人的房屋大门处也有这样的拱形门，只不过小一些。<sup>①</sup>

在加里奥特·佩雷拉笔下，泉州城已十分发达，人口稠密，物资丰富。一是城市景观华美宏大，城池坚固，使用了大量的石制构件，其门楼林立，装饰华丽；二是城市规划合理，道路宽敞，两旁商店众多，可以容纳 15 人骑马通行；三是商品贸易繁荣，一些诸如小装饰品的手工艺品已经成为城市消费的组成部分。伯来达《中国报道》印证了加里奥特·佩雷拉的说法：

我们到达泉州（Chincheo）前，必须经过许多地方，有的地方很重要。这个国家靠海的地方人烟稠密，因此你每

<sup>①</sup>【葡】加里奥特·佩雷拉《关于中国的一些情况》，澳门文化司、东方葡萄牙学会编《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十六世纪手稿》，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39页。

走一里都会看见一些城、镇或客栈，丰足地供应各种物品，致使他们平安地在城镇生活……从许多的这些地方，你将遇到两个人口众多的城市，与漳州（Cinceo）相比，不能分出其中哪个更大。这些城市 and 世界上任何城市一样有城墙。<sup>①</sup>

泉州和漳州成为中国东南沿海发达城市的缩影。繁荣的对外商品贸易使得城市容积不断扩大，同时也积累了丰厚的商业资本，使得城市生活较为富庶。

米列斯库还注意到漳州城市群体生活方式非常不同：“因为中国人把古董视无价之宝，尤其是古籍。这个城市人口稠密，装点有各种风格的建筑，商人极为富裕，居民非常灵巧，是各种行业的能工巧匠。”<sup>②</sup>富庶的人家收藏古玩成风，而普通居民则擅长各种行业，以技能谋生。这背后也折射出闽南城市的商业化特征。伯来达则对泉州城中的士绅阶层非常感兴趣，“老爷”一词是他们的统称，包括“陆、海的尉官，警长、巡尉、税收官等”，他们拥有着尊贵的地位、特殊的服饰以及城市的管理权限<sup>③</sup>。

## （二）乡村生活

与城市生活形成对比的是，闽南乡村生活非常贫穷，尽管人口依然稠密，但是农耕垦殖是基本的生计方式。伯来达注意到城市和农村在经济上存在巨大的差距：“住在（城市）外面的却很穷，到处人太多，你可以多次在一棵树下看见成群的儿童，而本来会认为那儿是根本找不到人的。”<sup>④</sup>伯来达从泉州前往福州的路上，见到的境况则生动再现了闽南一带乡村生活的场景：

国内人烟稠密，没有一尺土地没有开垦；我们在往福州的路上没有看见什么牛群，只看见村民耕地的牛。拉犁只用

---

①【罗】伯来拉《中国报道》，【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中华书局，1990年，第3页。

②【罗】尼·斯·米列斯库著；蒋本良、柳风运译《中国漫记》，中华书局，1989年，第119页。

③【罗】伯来拉《中国报道》，【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5-6页。

④【罗】伯来拉《中国报道》，【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3页。

一头牛，不仅在这个省，在别的牛群多的地方也一样。这些村民耕地技巧好，我们则要用气力。这儿出售马桶里的粪便，尽管不缺牲口粪，在全中国人粪都是上好商品。使用肥料的农民从每条街收购这种肮脏的货物，买去施用于植物和树木。这种作法对保持城市清洁很有好处。<sup>①</sup>

在乡村，铁犁牛耕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方式。农民们熟练掌握了铁犁牛耕技术。粪便作为有机肥料也成为一种热销的商品，他们从城市购买粪便用于农作物土壤保肥的材料。但是，来自乡村的农产品也在东西方贸易浪潮中呈现出明显的商业化特征。米列斯库《中国漫记》记载：“这里（指漳州）生长的桔子是世上无与伦比的，味如香葡萄，不但新鲜桔子味美，桔子干也十分香甜可口。桔子销遍全国，还销往国外。”<sup>②</sup>漳州一带盛产桔子，王世懋《闽部疏》和何乔远《闽书》上都有“柑橘以漳州府为最”的记载，米列斯库的描述印证了这一说法。漳州桔在 17 世纪已经成为内销和外贸的农产品。这些记载不经意间反映了这一时期闽南地区强烈的商贸气息。

### （三）物价信息

传教士们在游历过程还认真收集了大量的物价信息，主要集中在食物的价格上。他们认为食物的价格与饮食习惯、生产方式存在关系。伯来达写道：

有大量的鸡、鹅、鸭，猪、羊，但没有阉羊。鸡是按重量出卖，别的东西相同。两磅鸡、鹅、鸭肉值他们的钱两分（for），那相当于一个英国便士。猪肉每磅一个便士。牛肉价同，那是因那些地区缺牛肉……但恰好中国人是全世界最大的吃客，什么都吃，特别好吃猪肉，对他们说越肥越好吃。我注意到，上面提到的食物的最高售价，如果你在这个国家大批购买，就会贱一些。蛙的价钱和鸡一样，他们视之为美味，狗、猫、鼠、蛇及其他脏肉食都是如此。<sup>③</sup>

<sup>①</sup>【罗】尼·斯·米列斯库著；蒋本良、柳风运译《中国漫记》，第 4 页。

<sup>②</sup>【罗】尼·斯·米列斯库著；蒋本良、柳风运译《中国漫记》，第 150 页。

<sup>③</sup>【罗】伯来拉《中国报道》，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 4-5 页。

作为日常动物食材，鸡、鹅、鸭、猪、羊是常见的肉食。其中鸡、鹅、鸭、羊、蛙肉价格较为低廉，最高售价约为两英镑值一个英国辨士。猪肉和牛肉同价，最高售价约为每磅一个辨士。蛙、狗、猫、鼠、蛇及其他脏肉被闽南人视为美味。尽管牛肉价格稍贵，其主要原因在于牛力是农耕的主要生产力。这些记载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闽南人日常的饮食习惯。

拉达《出使福建记》注意到中国大多数乡村物价水平很低，“一切东西都很便宜，东西都按重量出售，那怕雀鸟和薪材都如此”<sup>①</sup>。同时，他留意到泉州城普通百姓通常以铜钱为流通媒介，白银在百姓生活中并不常用，“我们只在泉州城及其属县见过一种货，那是一种带标记的铜钱，中穿一孔。他们给了我们三百二十个和三百二十个这种钱，抵四个里亚尔（rials）”<sup>②</sup>，物价的例子恰恰说明，贸易的繁荣促使城市社会阶层产生分离。

此外，一些文献还提到劳动力的价格。米列斯库将闽南地区与欧洲地区从事建筑行业的劳动力价格进行对比，他认为“（闽南）十个劳动力的费用仅抵欧洲一个劳动力的费用”<sup>③</sup>。可见，或是因为闽南人口众多加之建筑艺人掌握了熟练的建筑技艺，因此，每个劳动力费用仅为欧洲的 1/10，这些劳动力是可以买卖的。米列斯库的记载为了解明代工匠应役制度的转变提供了佐证。

概而言之，这一时期，刚刚接触闽南地区的传教士们，接触最多的是闽南日常生活，他们将其作理解中国人生活方式和习惯记录下来，直观反映了社会生活在大航海时代背景下，中国东南地区社会生活的变化，其明显的特征就是外国商品的涌入以及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

## 二、闽南商业贸易的拓展

据戴裔煊考证，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人就已经来到中国东南沿海进行走私贸易，由马喀兰夏的贸易舰队由广东上川航至

---

①【西】拉达《记大明的中国事情》；【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中华书局，1990年，第209页。

②【西】拉达《记大明的中国事情》；【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209页。

③【罗】尼·斯·米列斯库著；蒋本良、柳风运译《中国漫记》，第150页。

福建沿海<sup>①</sup>。福建闽南一带也因为对外的走私贸易为西方人所熟知：“葡萄牙人对泉州较为了解，因为多年习惯来它属下的一个货港做买卖。”<sup>②</sup>即言之，西方人所获得的闽南知识来自于长期以来的商业贸易。闽南商业贸易的拓展也成为 16-17 世纪西方文献重点描述的对象。这些记载不仅仅局限于商品的记载，也对贸易事件进行描述，其中夹杂着贸易冲突。

### （一）贸易商品

闽南物产丰富，16-17 世纪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商人分别在厦门（主要在浯屿、月港、走马溪一带）、吕宋岛建立贸易枢纽，从闽南地区获得了大量的农产品和手工产品，经大西洋航线至美洲销售。除此以外，漳州商人还与侵占台湾的荷兰人贸易<sup>③</sup>。从皮列士的《东方杂志》记载可以看出，葡萄牙人在漳州（Chancho）贸易过程中，获得了大量的素丝（即生丝），并获得药用樟脑：“素丝来自漳州；染色丝绸来自肇庆；花缎、缎子、锦缎、绫罗来自南京和 Anquem；珍珠来自海南；樟脑来自漳州。”<sup>④</sup>虽然直接记载贸易物品的史料不多，因为这些文献大多将从闽南贸易回来的物产都笼统概述为与中国的贸易成果。比如西班牙商人，其主要贸易产品就来自闽南和广东。1567 年，菲律宾总督黎牙实备（Miguel Lopez de Legazpi）向西班牙国王菲力普二世报告称：“中国商人每年都运生丝、毛织品、钟、瓷器、香料、铁、锡和染色棉布以及其他小商品，到菲律宾群岛出售，贩回黄金和蜂蜡，其中一些人到我们这里来。”<sup>⑤</sup>这份报告提及的贸易商品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闽南一

<sup>①</sup> 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笺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第 3 页。龙乐恒则认为葡萄牙人若儿惹阿尔发勒斯（Jorge Alvares）在 1513 年就已经到达广东，1517 年则是马来帆船抵达广东珠江口的内伶仃岛。1517 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向明朝派遣使节托梅·皮莱资（Tome Pires, 1465?- 1524 或 1540）。参见【法】龙乐恒《明隆庆、万历初葡萄牙、西班牙传教士述中国印章》，西泠印社编《第四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下册，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 年，第 886 页。

<sup>②</sup> 【葡】加里奥特·佩雷拉《关于中国的一些情况》，澳门文化司、东方葡萄牙学会编《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十六世纪手稿》，第 31 页。

<sup>③</sup> 【葡】博卡罗著；范维信译《要塞图册》，澳门《文化杂志》编《十六和十七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大象出版社，2003 年，第 227 页。

<sup>④</sup> 【葡】托梅·皮雷斯《东方概要》，澳门文化司、东方葡萄牙学会编《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十六世纪手稿》，海南出版社，1998 年，第 9-10 页。

<sup>⑤</sup> E.H.Blair 8.J.A.Robertson, *The Philippine, Islands.1493-1898*, Vol.2, Cleveland: Arthur

带，毕竟这一时期，因为“以彼为市”留居吕宋的漳州人已不下数千人<sup>①</sup>。

## （二）贸易争端

隆庆开关（1567年）之前，对外贸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官员的默许而非中央王朝。外商通过贿赂地方官员以换取秘密贸易权，地方官员由此获得外商厚重的私利。葡萄牙商人先在宁波贿赂商人获得贸易地位，并将这个“经验”带到了闽南商贸口岸。克路士写道：

因为当时风向不利航行到宁波，他们就前往泉州海岸，在那里发现了几艘葡船，向它们开战（月港与浯屿之战），并决定不许售给葡人任何货物。葡人在那里停留了许多天（有时打仗），看看有无挽救贸易的法子。但许多天过去了，看到无法可施，他们决定不顾而去。舰队军官知道这事，晚上极秘密地给他们捎去消息说，如他们想得到货物，那他们得送点礼给军官。葡人因这个信息十分高兴，备好一份隆重厚礼，按约晚上送去。从此后便有大量货物卖给他们，老爷们置若罔闻。假装没看见商人，当年的贸易就这样进行，这发生在1548年。<sup>②</sup>

地方政府背着中央王朝在应对外商问题上，采取了默许和清剿的手段。值得寻味的是，默许和清剿并不是对立的，地方政府和外商之间实际上存在一种秘密信息传递途径。地方官员可以“极秘密地给他们捎去消息”，这大致反映了闽南商人与葡商之间存在着极紧密的联系。随后，葡人开始在宁波诸岛过冬，“以致除绞架和市标（Polourinho）外一无所缺”<sup>③</sup>，甚至发生了劫掠百姓的事件。事态爆发后，中央王朝派出福建水师进行清剿，将“所有的商人、葡人

---

Clark Co., 1903-1907, p.238.转引自苏文菁总主编《闽商发展史》海外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页。

<sup>①</sup> 许孚远《疏通海禁疏》，《明经世文编》卷第四百，中华书局，1962年，第4332页。

<sup>②</sup> 【葡】克路士《中国志》，【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134页。

<sup>③</sup> 【葡】克路士《中国志》，【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133页。

和中国人一样，都被算在海盗之内”<sup>①</sup>，另一个与商贸有关的冲突事件就是 1549 年的“走马溪事件”。卢镗在朱纨的指使下，未经朝廷批准，处死在走马溪俘虏的海盗李光头等人。事后查明，其中部分人为葡萄牙商人。按照克路士的推测，朱纨与卢镗的动机一方面是想向朝廷邀功请赏，另一方面则是窃取葡萄牙商人的大宗货物。最终，钦差大臣在漳州、泉州调查后，事件逐渐澄清，葡萄牙人赢得了官司，朱纨与卢镗伏法<sup>②</sup>。

需要说明的是，与外商的走私贸易并不是完全充满争端，有时更充满智慧。1622 年 8 至 10 月间，荷兰商人雷尔松给巴达维亚总督顾思涵的几封信函揭示了闽南官商合谋走私的“途径”。是年，雷尔松舰队到漳州谋求通商，被漳州地方官驱逐，中间还发生了击沉中国商船的事件。尽管如此，地方官员几次通过商人黄明佐（Wangsan）与荷兰人协商，要求荷兰舰船离开漳州，同时承诺等荷兰人走后，“会派 10 至 12 艘戎克船载运各种商品去巴达维亚。他提议，跟我们就在此地签订那些货物的价格”<sup>③</sup>。这种官商合谋的方式避免了冲突，本地签订合同到异地交货，既“绕开”了中央王朝的禁令，又通过贸易获利，这可能是闽南商人的长期与外商贸易所积攒的有效经验。

到隆庆元年（1567 年），为应对东南沿海私商贸易情况，福建巡抚涂泽民上书隆庆皇帝申请开海禁：“请开市舶，易私贩为公贩。”<sup>④</sup>这得到中央王朝的允许，同年，“隆庆开关”实施。但是贸易冲突事件还是偶有发生。传教士文献反映明朝海外贸易政策的调整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充斥着国家与地方、和平和冲突因素。

### （三）打击海盗

闽南商业贸易的拓展过程，也包括打击海盗，维护航线安全。徐晓望认为，有明一代，漳州海面上的海盗活动猖獗，劫掠在闽南

<sup>①</sup>【葡】克路士《中国志》，【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 133 页。

<sup>②</sup>【葡】克路士《中国志》，【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 135-147 页。

<sup>③</sup>江树生译注《荷兰台湾长官致巴达维亚总督书信集 I（1622-1626）》，南天书局，2007 年，第 21 页。

<sup>④</sup>【明】许孚远《疏通海禁疏》，《明经世文编》卷第 400，中华书局，1962 年，第 4332 页。

与东南亚和西亚各港口贸易的中外商人<sup>①</sup>。当然，这些海盗也进行商业贸易，属于亦盗亦商的群体，他们的活动也伴随着闽南商业贸易的拓展过程。16-17世纪的西方文献也有诸多记载。1628年，澳门议事亭上书葡西联合国王菲力普三世（Felipe III）称，在1557年，击溃一横行中国沿海的漳州巨盗<sup>②</sup>。据汤开建考证，这一伙“漳州巨盗”当即委黎多《报效始末疏》中的“阿妈贼”<sup>③</sup>。此外，门多萨根据拉达的记载，还原了1575年间西班牙舰队与两广水师王望高舰队在马尼拉联合奇袭著名海盗林凤的事件，“焚烧了他的舰队，将其围困在城堡达3个月之久”<sup>④</sup>，其结果则是加深了明王朝与西班牙的“和平和友谊的关系”<sup>⑤</sup>。

#### （四）商业信息

在航海时代的贸易中，商业信息是一种及其宝贵的资源，它可以帮助商人降低商业风险，保障贸易利润的最大化。闽南地区外商云集，因此，也成为贸易信息的集中地。在《中国漫记》的描述中，泉州作为福建第二大城市，其“商业繁荣，经济富裕，规模宏大”<sup>⑥</sup>。同样，作为为福建第三大城市的漳州，位于九龙江（Hang）岸，江上桥市，两侧还建有宫殿式的房屋和货摊，出售来自世界各地和中国各地的商品<sup>⑦</sup>。在泉州和漳州都可以购买到世界各地和中国各地的商品。理所当然，这里也是商业信息的集中地。平托在其著名的《远游记》中如此描述：

在阿纳伊河弄到一切航行必需的给养后，我们便离开了这里。安东尼奥·德·法里亚认为到漳州港去为宜。甲·潘让也是这样建议的，再加上安东尼奥·德·法里亚一直非常注意保持同此人的友谊。在漳州可以打听到有关从巽他、满刺加、帝汶及北大年过来的葡萄牙人的

<sup>①</sup> 徐晓望《闽商发展史》总论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23页。

<sup>②</sup> 【葡】若尔当·德·弗雷塔斯（Jordao de Freias）《澳门16世纪历史资料》，澳门文化司署，1988年，第20页。

<sup>③</sup> 汤开建《委黎多〈报效始末疏〉笺正》，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2页。

<sup>④</sup> 【西】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编撰《中华大帝国史》，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113-117页。

<sup>⑤</sup> 【西】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编撰《中华大帝国史》，第113-117页。

<sup>⑥</sup> 【罗】尼·斯·米列斯库著；蒋本良、柳风运译《中国漫记》，第148页。

<sup>⑦</sup> 【罗】尼·斯·米列斯库著；蒋本良、柳风运译《中国漫记》，第148-149页。

消息，知道一些与其有关的情况，也可能还有关于双屿的消息。……抵达漳州港后，我们遇到了五艘葡萄牙大船。一个月前，他们从上述地方来。我们受到了他们的热情、隆重的款待。他们把当地、商品及治安的情况向我们做了介绍后，告诉我们说，他们得知的有关双屿的消息也是从中国人那里听来的。那里有许多越冬的葡萄牙人，还有人不断从满刺加、巽他、暹罗和北大年来。他们在那里安安生生地做生意。……在漳州港区逗留九天后，我们离开了那里。我们的队伍中又多了三十五个士兵。安东尼奥·德·法里亚好好利用了一番那五艘船。我们继续向双屿王国方向行驶。<sup>①</sup>

资料显示，漳州不仅在东南亚地区享有崇高的商贸地位。同样，在漳州可以获得巽他、满刺加、暹罗、帝汶及北大年葡萄牙商人的信息，也可以了解到国内双屿等贸易点的信息，并且在漳州的商船之间也彼此分享各地的商贸、治安等信息。暹罗、北大年的信息来源主要来自闽南与西亚贸易航线，而巽他、满刺加、帝汶的信息来源则主要来自闽南与东南亚贸易航线。这些信息是充满的流动性的，与商贸流通存在很大的关联性，这实际上也体现了闽南商人的贸易网络。

概而言之，闽南内联外通的商业网络使其成为这一时期海外贸易的繁荣区域。一方面，来自闽南的产品源源不断输送到海外，闽南已经不仅仅是贸易的中转地，更是贸易信息的流传地；另一方面，贸易冲突和打击海盗又成为贸易过程中的另一重要内容。这两方面的内容伴随着闽南贸易兴盛过程。

### 三、东西方文化交融的要冲

闽南地区是西方人最早进入中国的主要地区之一，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西方传教士的到来，一方面带来了以宗教为主体的西方文化，另一方面也将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西方传教士肩负着教会的使命，到中国传教，其主要任务就是吸收教徒，建立教堂和教会组织。这些活动，对中国文化景观和文化理念产生了深

<sup>①</sup>【葡】费尔南·门德斯·平托《远游记》上册，东方葡萄牙学会，1999年，第166页。

远的影响。18世纪的汉学家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认为：“西班牙传教士是在一五七五年到达漳州的，曾要求居留漳州学习汉语和传教，但未获准。但十七世纪初，西班牙又陆续派遣少量传教士来华活动。”<sup>①</sup>可见，早期的文化交流主要集中在宗教方面。

### (一) 宗教建筑

宗教建筑是教徒从事宗教仪式的圣神场所，也是西方宗教传播确立的标志之一。经过种种努力，从16世纪70年代始，西方传教士才真正登陆闽南地区(见表1)。但是，他们的主要工作还完全涉及传教，如多明我会士赫雷德(M. DeHerada)在泉州的活动主要是科研，而拉达等人则是受邀联系马尼拉和漳州，属于外交性质的活动。17世纪以后，传教士才开始进行传教。相比较福建各府县开教时间，闽南地区要略迟于闽北地区，据林金水等人的研究，福州约在1617年，而闽南地区的泉州约在1625年，漳州、晋江、永春约在1635年<sup>②</sup>。但是，教会发展很快，到1638年，泉州一府就有已经有教堂十三所<sup>③</sup>。1674-1684年间，全闽新建的十二所教堂中，漳州就占三所<sup>④</sup>。到17世纪末期，西方宗教文化景观已经非常常见，《中国漫记》如此描述：

(漳州)府城下辖十个小城镇。城里发现好些带有基督教标记的石块，如十字架、神像、救世主像、圣母玛丽娅像等等。还发现有汉白玉十字架。此外，耶稣会士还在这里发现了一本用古拉丁文书写的圣经。<sup>⑤</sup>

可见，到17世纪末，西方宗教建筑符号已经扎根在闽南地区，为闽南地区建筑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

---

<sup>①</sup>【美】卫三畏著；陈俱译《中国总论》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31-432页。

<sup>②</sup>林金水主编《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10页。

<sup>③</sup>【法】费赖之(Aloys Pfister)著；冯承均译《入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136页。

<sup>④</sup>Jose Maria Gonzalez.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1632-1700*. Madrid. 1964.p.629-671；转引自吴巍巍《闽台基督宗教关系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74页。

<sup>⑤</sup>【罗】尼·斯·米列斯库著；蒋本良、柳风运译《中国漫记》，第149页。

表 1: 16-17 世纪入闽南地区主要传教士名录<sup>①</sup>

姓名	籍贯	教会	时间	地点
赫雷德 (M. DeHerada)	西班牙	多明我会	1575	泉州
马丁·德·拉达 (Pde Ra-da)	西班牙	奥斯定会	1575	漳州
哲罗尼莫·马林 (P.Jerome Marin)	西班牙	奥斯定会	1575	漳州
费尔南多·德·卡斯特罗 (Fernando de Castro)	西班牙	多明我会	1593	漳州
路易斯·甘杜罗 (Luis Gandullo)	西班牙	多明我会	1593	漳州
胡安·德·卡斯特罗 (Juan de Castro)	西班牙	多明我会	1593	漳州
罗如望 (Joao daRocha)	葡萄牙	耶稣会	1616	漳州
巴多罗梅·马丁内斯	——	多明我会	1618	漳州
艾儒略 (Julcs Aleni)	意大利	耶稣会	1634	泉州
聂石宗 (Pietro Canevari)	意大利	耶稣会	1635	泉州
利畸 (Vittorio Ricci)	意大利	多明我会	1654	厦门

<sup>①</sup> 本表资料来源:【法】费赖之(Aloys Pfister)著;冯承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萧若瑟著;徐宗泽译《天主教传行中国考》,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林金水主编《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吴巍巍《闽台基督宗教关系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年。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年。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册,湖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

鲁日孟 (Juan de Yrigoyen)	西班牙	耶稣会	1678	厦门
傅圣泽 (Jean Fran SoisFouquet)	法国	耶稣会	1699	厦门
佩德罗·皮努拉 (Pedoro Pinnela)	墨西哥	方济各?	1699 ?	漳州
高一志 (Alphonsus Vagnoni)	意大利	?	1640 ?	漳州
贾宜睦 (Hierongmus de Gravina)	意大利	?	1662 ?	漳州
卢日满 (Franciscusde Rougemont)	荷兰	?	1676 ?	漳州

## (二) 文化对话

西方传教士在闽南地区传播，需要面临的问题除了明朝的禁令就是文化的差异。在明清易代之际的社会动荡中，中央王朝对地方的控制力削弱给了西方传教士传教的机会。因此，克服文化差异成为他们必须跨越的藩篱。翻阅大多数入化传教士的传记可以发现，他们都有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字的经历。其中不少人精通中国文化，对中国的宗教、哲学有着相当程度的了解。

在科技方面，传教士介绍了西方的科技文明和学术，推进了“西学东渐”。他们批判中国的科学技术，认为中国虽然掌握着一定的科学技术，但是“只知事物的皮毛，其他一无所知”<sup>①</sup>，认为中国科技落后，“他们完全不知道几何，也没有圆规，除加减乘除外不会别的计算。他们认为太阳月亮是通人性的，天是扁的，地不是圆的”<sup>②</sup>。十进十出泉州和二进二出漳州的艾儒略，其著作达三十三种，其著作《西方答问》二卷由晋江人蒋德璟编辑刊印，介绍了西方医药、兵备、历法、地图、制造、西学等四十三种内容。佩德

<sup>①</sup>【西】拉达《记大明的中国事情》【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中华书局，1990年，第210页。

<sup>②</sup>【罗】伯来拉《中国报道》，【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203页。

罗·皮努拉（又译名“石铎录”）1676年来华，1704年7月30日死于漳州，他更是翻译西方药理学专著《本草补》，全书介绍了十三种药物药效，附有三种疾病疗方九首。

在宗教方面，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本土宗教甚为抗拒，他们对在闽南地区看到的佛教仪式非常不解，拉达描述了他们在泉州一所佛寺见到的情形，将僧人早课的音调比拟为西方的送丧曲<sup>①</sup>，在对待中国本土的民间宗教时，他描述了在闽南商船的经历：

而为吾主的荣誉起见，我不愿保守如下的秘密：在一天一夜的风暴中，我们发现自己处于危境，中国人告诉我说，因有我们这些教士在场，上帝解救了他们，为我们之故，他们放弃了通常在这类险境中向附在船尾的偶像所举行的仪式，因为我们曾告诉他们说那样做是徒劳无益的，他们应向唯一真正的上帝求助。倘若他们真向他们的偶像礼拜，那他们是偷偷干的，没让我们看见。<sup>②</sup>

虽然拉达此行目的不在于传教，但是作为一个传教士，他将暴风雨中商船转危为安归结于上帝的保佑，告诉船工“应向唯一真正的上帝求助”而非“船尾的偶像”。此外，传教士们也将伊斯兰教徒视为异教徒，称之为“摩尔人（Moors）”。需要指出的是，西方传教士们在传教过程中，与中国士大夫的交往过程中，结交了不少闽南士绅。以艾儒略为例，他随福清人叶向高入闽，结识了晋江人张瑞图、何乔远、谢懋明、蒋德璟、张赓父子，永春人庄际昌、陈景明、陈景耀、黄贲宇、郑思阶、姚则坤、张筠伯、颜安德、颜之复，泉州人，安溪人林尔元、林锈、林擎云，德化人王晖宇、柯楨符，漳州人严赞化、严刚克、林有杞、吴任恒、徐羽伯、孙儒理等等<sup>③</sup>，这些士绅对于传教起到重要作用。一方面，他们帮助艾儒略翻译书籍和记录传教历程，如张赓、颜维圣、陈景明、陈景耀、严赞化都是《口铎日抄》记录者。张赓在刊刻传教士论著中也起到关键作用，为艾儒略的《五十言余》、《圣梦歌》、《口铎日抄》、李九功的《励修一鉴》、孟

<sup>①</sup>【西】拉达《出使福建记》【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中华书局，1990年，第220页。

<sup>②</sup>【西】拉达《出使福建记》【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220页。

<sup>③</sup>林金水《艾儒略与福建士大夫交游表》，《中外关系史论丛（五）》，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92-199页；林金水《艾儒略在泉州的交游与传教活动》，《海交史研究》1994年第1期。

儒望（Joannes Monteiro）的《天学略义》、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的《况义》等天主教书籍作序；另一方面，他们帮助艾儒略创建教堂，如张赓就曾协助艾儒略筹划创建泉州教堂。可以说，闽南士绅在西方宗教传播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然，西方宗教的传入也不是一帆风顺，利畸（Vittorio Ricci）的记录揭示了黎玉范神父因避福州教案而路过漳州时被谩骂和欺凌的经过，“这种折磨从早上十点持续到下午五点，达七个小时之久”<sup>①</sup>。但是，整体而言，传教士在闽南地区的传播是非常成功的。

在哲学方面，入闽南的传教士积极向教徒们传输西方宗教思想，虽然他们也都批判中国传统宗教，但是批判力度相对温和，这反映了他们传教过程更重视文化适应。张先清将其概括为“知识传教方式”，认为闽南地区浓厚儒学积淀和儒学网络为此提供了必备的前提条件<sup>②</sup>。从《口铎日抄》内容看，艾儒略等人与闽南诸生严赞化、张赓、张识等闽南士绅的对话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口铎日抄》还记录了艾儒略等人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检讨，如与漳州郑孝廉者讨论《易经》中“太极”概念时，将太极解释为“元质”，而非造物主；又如与严赞化讨论灵魂时，认为孝敬父母也是灵魂之德。

### （三）文化输出

在这一时期的传教士文献中，闽南地区物产丰富，商贸繁荣，文化多样。闽南文化也随着商贸的流通传播到世界各地。一方面，泉州和漳州成为中国重要地标城市，也成为西方人眼中中国城市的代表。伯来达写道：“最为葡人所知的是泉州（Chin-cheo），因为它下面有个港口，他们过去经常到那里去作生意。”<sup>③</sup>门德萨更是赞美道泉州城，“可能有 70000 户。它有大宗贸易，供应各种物品……河里停泊着 1000 多艘各式各样的船……（商店）摆满丰富的商品，很有价值也很奇特”<sup>④</sup>。可见，闽南地区的富庶程度早已为西方人所熟知。这一时期，闽南的地名也被标记在西方人早期的地图

<sup>①</sup> Victorio Riccio. *Hechos de la Orden de predicadores en el Imperio de China*, Manila, 1667 年，卷第二，第二十四章。转引自张先清《小历史——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相遇》，商务印书馆，2015 年，第 77 页。

<sup>②</sup> 张先清《小历史——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相遇》，第 72 页。

<sup>③</sup> 【罗】伯来拉《中国报道》，【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 1 页。

<sup>④</sup> 【西】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编撰；何高济译《中华大帝国史》，中华书局，1998 年，第 198-199 页。

之中，如 16 世纪葡萄牙传教士巴尔布达的《中国新图》就标志出 Chincheo（漳州）、Chabaqueo（走马溪）、Imau（厦门），罗伯·欧蒙的《世界地图》也标出了 Chincheo（漳州）等地名，瓦兹·多拉多（Vaz Dourado）1571 年的《古代东亚航海图》第八图也标注出泉州（刺桐，Chimche）等等。这进一步说明，闽南地区的地名已经成为重要的地理标志。另一方面，由传教士编纂的闽南方言辞书也是闽南文化对外输出的标志。传教士们最早接触的是福建人，因此有关闽南话的整理和研究也是最早的。从 16 世纪开始，闽南方言文献就陆续编纂出版，如 1575 年拉达在马尼拉出版了西班牙语与泉州土音对照的词汇集《华语韵编》（Artey 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China），1602 年西班牙耶稣会士契林诺（Pedro Chirino）编纂西班牙语与漳州土话对照的《闽南方言与西班牙卡斯蒂利亚语对照字典》（Dictio-narium Sino Hispanicum）。据意大利学者马西尼（Federico Masini）的考证，16 世纪末至 17 世纪初，西方传教士至少编纂了十种闽南语相关的辞书，现至少存六种<sup>①</sup>。

总之，16-17 世纪的闽南地区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要冲，传教士们带来的西方宗教文化对闽南地区的影响是全方面的，教堂的建立为建筑景观注入了新的文化气息，科学技术的传播也使得闽南地区成为“西学东渐”的前沿地带，与此相应的是发生在闽南地区的宗教文化对话也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同时，随着航海贸易和移民流动，闽南文化也向全世界输出，闽南的城市和海港成为中国重要的地理标志，闽南方言也成为西方传教士学习了解中国文化的桥梁，成为“中学西渐”的一个起点。

## 结语

对于中国而言，16-17 世纪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以贸易和宗教为主体的交流，使中国逐渐融入到世界网络之中。闽南地区独特的地理优势，在“西学东渐”和“中学西渐”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和碰撞的过程中，传教士历史书写扮演着重要的纽带作用。这些文献直观揭示了这一背景下闽南社会生活信息，商

<sup>①</sup>【意】马西尼（Federico Masini）《罗马所藏 1602 年手稿本闽南话—西班牙语词典——中国与西方早期语言接触一例》，邹嘉彦、游汝杰主编《语言接触论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年，第 211-228 页。

贸网络的拓展和东西方文化的互动等情况。可以说，透过这些历史书写所承载的信息，我们可以更加清楚明清易代之际闽南社会的多维镜像，它提供了另一种研究闽南社会变迁的“他者视角”。将传教士文献进行合读和互照，更有助于深入理解相关史学问题。

传教士们肩负着传教使命来到闽南地区，将其经历和思想付诸文本，其文献同样蕴含了以宗教为中心和以西方价值观为中心的关怀。除了传教士们在闽南地区完成的宗教著作外，他们的闽南游记史料也充斥着他们对传教地可能性的“评估”。谢和耐的研究提醒我们，传教士的文献“往往受到了护教和宗教感化之成见的启发”<sup>①</sup>。这种价值关怀与以儒家伦理价值为核心的传统史学文献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是，恰恰是这种文献的对读，更有利于我们对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的考证。

传教士文献中的闽南书写是在“中国—世界”的语境下产生的。无论是商贸网络还是文化网络中，闽南都作为中国、亚洲和世界的一部分进行叙述。因此，这种历史叙事的也与以往的中国历史文献存在差异性，它提供了一个更广的更具有关联性的地理空间来理解闽南社会。利用传教士文献研究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东西方文化对话是目前学界努力的主要方向。在论证过程中，一方面学界往往将这类史料视为中国本土史料的“有效补充”，努力寻找东西方史料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互证，缺乏对“时间、空间”的整体评估；另一方面，受“眼光向下”史学思维的影响，过往的研究更为重视传教士游记文献的使用，对“宗教性文献”的价值认识较为缺乏<sup>②</sup>。当然，由于异文化的因素，传教士闽南文献也存在诸多不足和错漏之处。但是重估 16-17 世纪西方传教士闽南文献，对于理解中国文化进程和闽南在海上丝绸之路节点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陈妤佳

校 对：周佳燕

<sup>①</sup>【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碰撞》，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7页。

<sup>②</sup>张志刚《史料、史实与史证——重估“传教士所撰中国文献”的价值》，《世界宗教文化》2019年第5期，第19-25页。

# **Minnan in the Western Travelogues of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A Global Perspective**

**Ou Junyong**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marked a pivotal period for missionary activities in China. The distinctive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maritime trade traditions of the southern part of Fujian Province, known as Minnan, positioned it as a frontier for Western exploration into China. Missionaries extensively travelled through Minnan during their missionary endeavours, documenting numerous travelogues that were later disseminated to Europe. This contributed to Minnan's significant historical role in the processes of "Learning from the West to develop the East" and "Learning from the East to develop the West". These literary works provide vivid depictions of daily life in Minnan, the expansion of commercial trade, and the interplay of East and West cultures. A reassessment of the preserved writings by Western missionaries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regarding Minnan holds crucial significance in 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s of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s.

**Keywords:** 16th-17th century, Western travelogues, Minnan , Academic significance